

基本館藏

186702



蘇聯經濟建設 的工人方法

中華書局出版

1
045

基本定價 39.00

160

蘇聯經濟建設
的
工作方法

中華書局出版

蘇聯經濟建設

的

工作方法

編者

華中書局

出版者

華中書局

發行者

華中書局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初版

1-8,000(X)

目 錄

新的環境和新的經濟建設任務	斯大林	一
斯大林論工業生產中的幾個問題	阿沙佐諾夫	九
蘇聯的工資政策	達布拉哈塔夫	一九
精簡與節約	真理報社論	二五
節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方法	德米特里·普琴科	二九
社會主義競賽是全國經濟文化高漲的有力槓桿	A·柯爾斯基	三七
社會主義的物質鼓勵	布勒格	四三
集體協議是組織勞動高漲的重要手段	V·庫茨涅佐夫	四八
論蘇聯的勞動生產力問題	吳清友	五六
論合作社	列寧	七二

附 錄

蘇聯的四個五年計劃	羅采輯	八二
-----------	-----	----

新的環境和新的經濟建設任務

——摘自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斯大林在經濟工作人員會議上的演說——

同志們！從這次會議所有材料當中可以看出，我們各工業部門執行計劃的情形是十分參差不齊的。在過去這五個月當中，有些工業部門出產量比去年同時期內增加了百分之四十至五十。而有些工業部門却只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最後，還有個別工業部門增加得極少極少，即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十，或且增加得更少。屬於最後這一種工業部門的，有採煤業與黑色金屬冶鑄業。你們看，情形是參差不齊的。

爲什麼有這樣參差不齊的情形呢？爲什麼某些工業部門落後呢？爲什麼某些工業部門只增加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而採煤業與黑色金屬冶煉業增加得更少，因而落後於其他部門呢？

就是因爲近來工業發展條件已經根本改變了，已形成了一種要求採取新式領導方法的新環境，而我們的某些經濟工作人員，却沒有改變工作方法，仍然拘守成規，按照舊方式工作着。所以問題就在於保證工業發展的新條件本來是要求採用新式工作方法，而

我們有些經濟工作人員却不瞭解這一點，不瞭解現在有採用新式領導方法之必要。這就是我國工業某些部門落後的原因。

保證我國工業發展的新條件，究竟是些什麼呢？這些新條件是怎樣形成的呢？

這些新條件至少有六個。

現在讓我們來考察這些條件吧。

一、勞動力

首先就是要保證各企業勞動力的問題。從前，工人照例都是自動跑進到工廠裏來，所以當時在這些事情方面是有過某種自流性。其所以如此，是因為當時有失業人口，有農民分化，有貧困，有逼迫人們離鄉進城的饑餓恐怖。你們大概還記得所謂『鄉下佬從鄉下逃進城裏去』的公式吧？當時有什麼東西迫使農民從農村裏跑進城市呢？就是因為有饑餓恐怖，因為有失業，因為當時農民覺得農村是他們的後母，而總想逃開她，隨便逃到什麼地方去，只要我得到一點什麼工作就行了。

在不久以前，我國情形曾是如此，或者幾乎是如此。

可以說我國現在的情形也是這樣麼？當然是不可這樣說的。恰巧相反，現在環境已經根本變更了。正因為環境已經變更了，所以我們也就沒有勞動力自流性了。在這一

時期中，究竟發生了什麼變更呢？第一，我們已經消滅了失業現象，因而也就消滅了壓迫「勞動市場」的力量。第二，我們已根本打破了農民分化的現象，因而也就消除了驅使農民由農村逃到城市的普遍貧困現象。最後，我們用數萬架拖拉機和農業機器供給了農村，擊潰了富農，組織了集體農莊，使農民有像人類那樣來生活和工作的可能。現在已經不可把農村叫作農民的後母了。正因為不可把它叫作後母，所以農民便留在鄉裏安居樂業，於是在我們這裏也就沒有「鄉下佬從鄉下逃進城裏去」的現象，也就沒有勞動力自流性了。

由此可見，我們現在已有了完全新的環境和保證各企業勞動力的新的條件。

但由此就應得出什麼結論呢？

第一個結論，就是現在已不可再指望於勞動力自流性了。這就是說，應當拋棄自流「政策」，而採取有組織地招收工人來供工業需要的政策。可是，要做到這步，就只有一個辦法，即各經濟組織與集體農莊和集體農莊莊員們訂立合同的辦法。你們知道，某些經濟組織和集體農莊已經開始採用這種辦法，而且實際經驗已經表明訂立合同的辦法，無論對於集體農莊或工廠企業，都是很有功效的。

第二個結論，就是必須立刻實行把最繁重的生產手續機械化，並儘量開展這件事情（例如林木工業，建築業，採煤工業，裝卸工作，運輸業，黑色金屬冶煉業等等）。這當然不是說要拋棄手力勞動。恰巧相反，手力勞動還會長期在生產中發生極大作用的。

但這是說：生產手續機械化，是我們所應實行的一個新類的和有決定意義的辦法，否則不能支持我們的發展速度，也不能維持我們的新的生產規模。

我們還有不少經濟工作人員，他們是「不相信」機械化，也「不相信」各企業與集體農莊訂立合同的。這就是那些不懂得新環境，不願意按新方式去工作，而眷戀着勞動力「自流」到企業中來的「舊日黃金時代」的經濟工作人員。不待說，這種經濟工作人員是與我們在新環境中所負的新的經濟建設任務相隔天壤的。他們大概認為勞動力方面的困難是一件偶然事情，認為缺乏勞動力的現象將會自行消滅，將會按所謂自流方式消滅下去。這是錯誤的想法，同志們。勞動力方面的困難，決不會自行消滅。這種困難是只有靠我們自己努力工作，才可消滅的。

總之，任務是要用與集體農莊訂立合同的辦法，來有組織地招收工人，同時要把生產手續機械化。

保證我國工業發展的第一個新條件問題，就是如此。

現在我們來說第二個條件。

二、工人工資

我剛才已經說過了有組織地招收工人來供我們各企業需要的問題。可是，招收工人

還不能完全了事。爲要保證我們各企業都有勞動力，還須把工人固定在生產中，使企業裏工人成份相當固定起來。沒有相當精通了技術，熟習了新式機械的固定工人成份，便無法前進，便無法完成生產計劃，這是無待證明的。沒有這種固定工人成份，就會要每次都來重新教導新的工人，就會要把一半時間用去教導新的工人，而不是用去進行生產。現在我們所有的實際情形，究竟怎樣呢？可以說我們各企業裏工人成份是相當固定的麼？可惜還不可這樣說。恰巧相反，在我們各企業裏，還有所謂勞動力流動性。而且在許多企業裏，勞動力流動性不僅沒有消滅，反而增長，反而加強起來了。無論如何，在半年當中，或者甚至在一季當中，沒有至少是百分之三四十的工人成份變更的企業，是不多見的。

從前在工業恢復時期，我們的技術設備還不複雜，生產規模還不宏大，尙可稍許「容忍」所謂勞動力流動性。現在情形却就不同了。現在環境已經根本改變了。現時在擴展改造時期，生產規模已經擴大，技術設備已是極端複雜了，於是勞動力流動性也就成了妨害生產的奇災大禍，足以紊亂我們企業了。在現時還「容忍」勞動力流動性，就會瓦解我國工業，消滅完成生產計劃的可能，破壞改善產品質量的可能。

勞動力流動性底原因何在呢？

就在於工資定得不對，就在於工資標準定得不對，就在於工資方面有一種「左的」平均主義。我們許多企業裏現行的工資標準，幾乎是把熟練勞動與不熟練勞動間的差

別，繁重勞動與輕易勞動間的差別完全抹煞了。因為有這種平均主義的現象，於是不熟練的工人也就不樂於變為熟練工人，因而喪失了上進的前途，於是他就覺得自己是這企業裏的『臨時住客』，只是暫時在這裏做做工，『賺幾個錢』，而過後就跑到別處去『尋找幸福』。因為有這種平均主義的現象，於是熟練工人也就不得不從一個企業跑到別一個企業，以便終於找到一個能夠真正重視熟練勞動的企業。

由此就有『普遍』流行的那種從一個企業跑到別一個企業的現象，就有勞動力流動性。

要消滅這種禍害，就須取消平均主義，打破舊的工資標準。要消滅這種禍害，就須定出適當的工資標準，注意到熟練勞動與不熟練勞動，繁重勞動與輕易勞動間的差別。熟練展鐵工人所得的工資與掃地工人所得的工資相等的情形，是不可容忍的。火車司機師所得的工資與抄寫人所得的工資相等的情形，是不可容忍的。馬克思和列寧說過：熟練勞動與不熟練勞動間的差別，甚至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甚至在階級消滅以後，也還會存在的；這種差別只有在共產主義制度下才會消滅；因此甚至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工資』也應按各人勞動來發給，而不應按各人需要來發給。可是，我們那些經濟工作人員和工會工作人員中的平均主義者，却不同意這點，而認為在我們蘇維埃制度下，這個差別已經消滅了。究竟是誰說得對呢：是馬克思和列寧呢，還是平均主義者呢？大概是馬克思和列寧吧。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誰在現時忽略熟練勞動與不熟練勞動間的差別，

而根據平均主義「原則」來規定工資標準，誰就是離開了馬克思主義，離開了列寧主義。在每個工業部門中，在每個企業中，在每個車間中，都有一部份主要的較爲熟練的工人，我們如果真想保證企業裏有固定的工人成份，就應當首先而且主要是把他們固定在生產中。他們這一部份主要工人，就是生產工作底基本環節。把他們固定在企業中，固定在車間中，也就是固定全體工人，而根本剷除勞動力流動性。可是，怎樣才可把他們固定在企業中呢？要把他們固定在企業中，就一定要提拔他們上進，提高他們的工資水準，正確規定工資標準，使各工作人熟練程度都能得到應有的報酬。而提拔他們上進，提高他們的工資水準，又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除其他一切而外，還要使不熟練的工人有上進的機會，使他們有力求上進的刺激，力求變爲熟練工人的刺激。你們自己知道，我們現在需要幾十萬幾百萬熟練工人。要培養熟練工人，就須使不熟練的工人有力求上進的刺激和前途。我們愈是大膽這樣辦，結果也就會愈好，因爲這是消滅勞動力流動性的基本方法。在這件事情上節省金錢，就等於作惡犯罪，而違反我們社會主義工業底利益。

但這還不能概括一切。

爲要把工人固定在企業裏，還須更加改善工人給養和居住條件。固然，我們近幾年來在住房建築和工人給養方面，已作了不少的事情。可是，我們所已作到的，還完全不夠滿足工人們迅速增長的生活需要。決不可藉口說什麼從前住房比現在少些，因此也可

以用已有的成績來安慰自己。也不可藉口說什麼從前工人給養比現在不知要壞多少，因此也就可以認為現有情形已算滿足。只有那些腐化的，完全腐朽了的人，才能藉口往事來妄自安慰。不要用往事來做標準，而要拿現在工人日益增長的生活需要來做標準。必須瞭解，我國工人生存條件已根本改變了。現在的工人已不是從前那樣的工人了。現在的工人，我們蘇聯的工人，希望滿足他們自己一切物質和文化的需要，這就是說，他們既要有充足的糧食，又要有合適的住所，而且還要有文化生活以及其他各種需要的保證。他們有享受這些幸福的權利，而我們則負有保證他們這些條件的義務。固然，他們已不復遭受失業痛苦，已擺脫了資本主義桎梏，已不是奴隸，而是自己事業的主人了。可是這還不夠。他們還要求滿足他們一切物質上和文化上的需要，而我們也就應該滿足他們這種要求。你們不要忘掉，現在我們自己也向工人提出一些要求，要求他們遵守勞動紀律，努力工作，實行社會主義競賽，進行突擊運動。你們不要忘掉，絕大多數工人已用無限熱忱接受了蘇維埃政權這些要求，並英勇地執行着這些要求。既然如此，無怪工人們在執行蘇維埃政權這些要求時，也要求蘇維埃政權履行它所負的義務，即更加改善工人物質和文化生活的義務。

總之，現在的任務是要消滅勞動力流動性，消滅平均主義，正確規定工資，改善工人生活條件。

保證我國工業發展的第二個新條件的問題，就是如此。

斯大林論工業生產中的幾個問題

阿沙佐諾夫

編者：這篇文章原題『斯大林對蘇聯青年的講演詞』，係爲紀念斯大林在蘇聯共青團第五屆代表大會演講的二十週年而作。文中主要闡述有關提高生產的諸問題，可作爲我們目前的借鑑，故特發表於此。

一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九日斯大林在蘇聯共產主義青年團代表大會上演講，他對當時國內外情形都會加以深刻的分析。斯大林這篇講演詞對於蘇聯經濟理論是極珍貴的貢獻，是爲馬克思主義創作的典範，使得蘇聯國家在被包圍的環境下能正確地來確定其方向。

那期間國內所處的情勢如何呢？

蘇聯人民於一九二七年初，已達到恢復被帝國主義和內戰所摧毀的國民經濟。工業和農業不僅已達戰前之水平，而在一些生產部門中，已經超過了這一水平。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在布爾什維克黨第十四屆代表大會上曾決議，蘇維埃國家堅決執行了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之方針。只有社會主義工業化，方能保證蘇聯經濟獨立性，能保證脫離資本主義國家依賴，鞏固蘇聯國防並建立社會主義勝利之必要條件。

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工業在國民經濟中比重已達百分之八十六的工業乃是屬於社會主義工業體系的。蘇聯在這時間投入工業中之巨款約十萬萬盧布。具備了著手建築龐大企業，如尼伯爾水力發電站，土西鐵路、斯大林拖拉機工廠、機械製造廠及其它規模企業的可能性。

斯大林曾指出有以一切力量加強國家工業化速度之必要，誠如列寧所說：「爲要挽救俄國，就不僅要農業經濟有良好收成，——這還不夠，——也不僅要那替農民供給消費品的輕工業有良好的情況，——這也還是不夠，——我們還要有重工業。」

但是這種重工業當時在俄國是沒有的，是應當建立的，爲了不在世界資本主義面前，使我們成爲窮弱和落後的國家，我們必須在最短期間建立起這種重工業來。

爲此，共產黨和蘇維埃國家就將自己底主要的注意力轉到經濟建設，改造國民經濟以及建立強有力的工業基礎上面去。

黨的忠實助手共產主義青年團也集中了其全部力量解決了這些問題。關於目前形勢和黨的政策，關於青年參加生產運動以及共青團經濟工作之任務問題都是當時蘇聯共青團代表大會上的中心問題。

斯大林講演的第一部份曾闡述了在工業部門中黨的和蘇維埃的經濟政策。現在蘇聯已經有了生產技術的豐富經驗來管理社會主義的各項企業。但在那時，這個經驗只是在積累中。爲了使蘇聯的企業工作得更好，工業品出產得更多，更以先進的技術裝備起來，更加發展與鞏固，須要怎樣去作呢？

以後，莫洛托夫說過，一個工廠製出的優良產品的數量的，較外國的同樣工廠的產品只多不多的話，那才叫做按社會主義方法工作的。擺在幹部面前之任務乃是尋這樣一條基本路線，就是說，這樣路線之實現，則可保證企業能真正的按社會主義方式來進行工作。

斯大林在其演詞中已指出了這條路線。該路線便是有計劃的減低工業品成本費；有計劃的減低工業品的批發成本費。斯大林將減低成本費稱之爲蘇維埃工業道路的里程碑。蘇維埃工業只要順此路走，便能夠自己鞏固起來，引導農業前進並在國民經濟一切部門中保證社會主義的勝利。

爲什麼減低工業品的成本費是黨和蘇維埃國家掌握發展和鞏固國家工業化的主要槓桿呢？斯大林對此指出了四個基本原因。

第一、每一企業要減低成本，這一企業及其工作人員及領導者就必須設法有系統地改善生產工作，不斷採用新的技術並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新的技術，成本費是度量每家企業經營之基本準繩。減低成本迫使工廠負責人不得不經常關心勞動組織的改善，並精通經濟管理的方式方法。換言之，就是使得這一企業不得不充分動員一切企業的內部資源，其中包括主觀的因素，即是本企業工作人員覺悟程度和組織程度。在這些基礎上，在蘇維埃工業中廣泛地展開了經濟核算這一社會主義管理工業的方法。

第二、因為蘇聯工業是奠基於國內市場之上的，成本費的減低便被這一基礎所決定。這麼一來，各工業企業乃至於整個工業便都能將其注意力放在擴大該市場的容量上面。只有廉價的物品方能引起大眾的購買力，同樣也就擴大了國內市場。

第三、有計劃的減低工業品價格是提高勞動人民生活水準的必要條件。共產主義不是建築在貧窮生活基礎上的某些物質的平分。這是小資產階級對社會主義的理解。社會主義是建築在日益提高的生產力的基礎上，這種生產力比資本主義的生產力高，它是建築在生產品和各種用品豐富的基礎上。蘇維埃國家採取各種措施提高實際工資。減低價格乃是蘇聯人民豐衣足食的生活與文化生活的決定條件之一。

第四、減低價格將鞏固城市與鄉村間的團結，工人階級與農民間之密切團結。而這種團結乃是蘇聯工人階級專政基礎。內戰後的頭幾年由於蘇維埃工業極端薄弱以及躲在蘇聯國民經濟最高會議的托洛茨基分子的反動行爲，國內形成了所謂「剪刀」現象，即

是價高的工業品與價格低廉的農業品之間的尖銳矛盾。黨和蘇維埃國家會共同採取了許多對策才撲滅了這種「剪刀」現象。如果要永遠不再發生這些不平衡的現象，就必須有計劃的減低工業品的成本費。

三

斯大林不僅確定了社會主義工業發展和鞏固之道路，同時還指出，有效的實現減低工業品成本費之政策。他指出了社會主義生產合理化以及管理經濟的思想。

這一思想包含着經濟管理的社會主義方法的基本問題：根本的改善生產技術，工廠裏的勞動組織，改善並精簡一切經濟機構，同官僚主義和二流子現象作堅決的鬥爭以及大大的提高生產力。

斯大林將社會主義生產合理化與經濟的管理稱之為一個當前具有決定性質的問題，這些問題在相當長的年份中，決定着黨和蘇維埃國家中的工業政策。

社會主義企業工作的根本改善能使黨與國家提高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本積累，並能使用在此基礎上所獲得的積蓄而轉向進一步地擴大與發展蘇維埃工業方面去。

斯大林在代表大會上的演講中說：「共產主義青年團——永遠站在我們先進戰士的行列中。我不知道他落後於我們革命生活事件的情形。我想在今天，「共青團」在實現

社會主義合理化的問題上也會佔有其相稱的地位。』

共青團和蘇維埃全體青年熱烈地響應着斯大林的號召。全國各地都洋溢着青年合理化工作者的運動熱潮。青年團支部建立了發明家小組，擔任了對某些車間以及機床的指導工作。青年團員深刻研究生產技術和生產過程。

列寧城「紅三角」工廠的青年團員發起了第一青年突擊隊。當新的和先進方法注入生產過程時，突擊運動便成了社會主義勞動關係的新形式，而且這個運動普及了全國。莫斯科、烏拉爾、伊凡諾夫、高爾基城以及國內其它各工業中心都建立了突擊隊。突擊隊應用在新建築工程上是收效極大，因為建築工程已能進一步採用了先進的工作方法，因而大大地促進了建築的速度。突擊隊員開闢了提高生產力的道路，這是新社會主義制度勝利最重要的東西。

突擊運動乃是進入社會主義競賽偉大浪潮之第一準備階段，這一運動也是在共青團發起下於第一個斯大林五年計劃中產生的。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於真理報上登載了列寧於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八年冬寫的『如何組織競賽』一文。列寧在本文中曾號召蘇聯人民按新方法勞動，並組織社會主義競賽，共青團靈活地掌握了列寧這些天才獨創的見解。在莫斯科、列寧城、烏拉爾和烏克蘭各工廠的青年工人會議上組織了競賽運動。參加競賽者有列寧城機車製造廠『紅色路工』的青年工人、哈爾科夫『無產者』紡織工廠及其它工廠青年工人。一九二九年四

月全蘇聯第十六屆黨代表大會向全體工農號召支持共青團之這一開始，並廣泛地開展社會主義競賽運動。

斯達漢諾夫運動是社會主義競賽運動的更高階段。青年和共青團在這方面也實現了斯大林的期望。青年羣中湧現了成千累萬的生產革新者，這些人是文化上有準備，精通技術，節省時間的能手，在工作中他們也表現出自己是準備、細膩的模範。這些學會了發揮技術的最大的效能。

青年團員和青年就是如此完成着斯大林的偉大指示。

四

蘇維埃工業的發展道路是艱苦而且困難重重的。幾乎一切都是創始，蘇聯工業完全依靠國內的資源，毫無外援。布爾什維克黨公開警惕了勞動者說，他們是要克服許許多多的困難的。

斯大林在共青團第五屆代表大會上的演講中指出：「我們革命歷史告訴說，爲我國整個工人階級利益而邁進的每一嚴重的步驟，沒有一次不是經過工人階級各別集團的犧牲的。就拿內戰來說吧，在內戰時期曾有過嚴重的犧牲，雖然現在也有小的犧牲，但無論如何也不能與國內戰爭時期所有的那種嚴重犧牲相提併論的，你們可以看到，現在我

們那些犧牲，已取得百倍的報償。用不着再證實，目前微小犧牲定會在不久的將來取得千萬倍的報償的。所以我認為，我們不應該在為整個工人階級利益的犧牲面前就停止自己的步子。」

善於清醒地評價目前形勢，同時自覺地為預定的目標而去迎接某些犧牲，乃是布爾什維克珍貴的品質。第二次世界大戰，給全世界人民帶來了數不盡的災難。蘇聯國民經濟遭德寇侵襲摧毀較任何其他國家尤甚。因此，戰後的恢復工作，就要求蘇聯工農及職員，要求蘇聯青年為了工人階級整體的利益，而去迎接某些犧牲。

然而，正如日丹諾夫於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二十九週年的報告中所指出的，「此種犧牲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和職員們方面的犧牲比較起來，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他們那種犧牲是異常重大的，因為資本家不關心戰後復興事業，而將全部困難完全轉嫁在工農和職員的肩上。這些困難首先表現在失業者數目的激增，把千百萬工人和職員拋出企業。」

在資本主義國家中，伴隨着戰時經濟向和平時期經濟過渡而來的，則是經濟和政治的危機，縮減生產、企業倒閉失業激增。甚至在最富有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誰都知道一九四六年工業生產範圍較一九四三年縮小了三分之一強，而根據官方材料，失業人數也超過三百萬以上。這支失業大軍由於前線復員回來的戰士不能找到職業的原故而日增無已。比如，一九四五年下半年的加拿大，百分之二十復員軍人已墮入失業的深

淵。

資本家利用戰後時期的困難更其加緊了壓榨，及進一步降低勞動人民生活水準和治權利。一九四六年初，美國國會通過了基茲法案，其目的乃是壓制罷工運動，破壞工會組織。然而只有美國的工人階級的抵抗與美國進步力量才不准許反動資產階級來實現此等議案。

偉大的蘇聯國家沒有任何的危機或震動的轉向了和平建設。蘇聯由戰爭過渡到和平，使生產大大地擴大了。關於這方面有數字足以說明，在一九四六年已經建好，恢復及開工的國家企業的約八百家。恢復並已開工的有六個熔鑛爐，十八個熔鋼爐，九個軋鐵機，壓延機，十一座焦煤爐，三十六所巨大的煤礦，發電站裏有一百一十七個發電機，紡織工廠裏有約三十萬個紡錘，國家企業和機關以及村蘇維埃已建築和恢復起六百萬平方公尺住宅面積。

蘇聯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有失業現象——這種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人民的艱鉅災難。復員軍人已找到自已的適當工作。一九四六年在蘇聯國民經濟中的工人和職員之數目已增加三百萬之衆。

偉大斯大林所教育的蘇維埃人民和布爾什維克黨，不怕困難和暫時的犧牲。他確信地看到了光明的未來。

斯大林在蘇聯共青團代表大會上的講演迄今已二十年了。然而斯大林的思想之偉大力量在於他的話直到我們今日仍然那麼尖銳與那麼有力。在斯大林新五年計劃中，蘇聯人民應該去迫切解決的任務，要求從各方面加強社會主義合理化，更要大規模地動員一切內部資源，提高生產力，改善生產管理。減低工業品的成本費依然是提高蘇聯工業主要因素之一。那末，研究斯大林在共青團代表大會上的講演，便能夠以社會主義生產發展規律和蘇聯經濟理論的意義來武裝蘇聯幹部。

(任飛譯)

蘇聯的工資政策

達布拉哈塔夫

在代表工人的工會組織與蘇維埃工業企業經理部門簽訂集體協定時，工資自然佔了很重要的位置。解決工資問題所遵守的原則最好是拿機器與開整機工業的例子來說明。計件制在全蘇聯很通行。特別是累進制廣泛地應用於超過計劃的生產。在累進制中，產品超過規定量在百分之十以內者工資增加一半，超過規定量百分之二十到三十者工資加倍。

經驗表明：計件工資能更有效地利用機器，與更好地組織勞工。只有當難於（或不可能）做出規定量與確切登記所做的工的時候——例如輔助工人，才保持着計時工資。可是在仍然實行計時工資的各種職業中，其傾向也是最大限度地採用計件制。

實踐也表明：計件工資是大大增加產量，因此也是大大增加工人工資的槓桿。在許多情況下，計件工資無法實行時，可保持月薪制，然在超過計劃時要分紅。必須注意的是，只有事先規定了分紅與分紅的多少，這種制度才能有效。

二

去年機器與開整機工業中百分之七十的工人實行了計件工資，今年則增加到百分之八十。規定擴展計件工資制的條款，寫在所有今年簽訂的工人——廠方的集體合同上。最近的一例是伏利茲爾工具工廠所起草的合同，該合同責成廠方擴展計件工資制，除了因種種理由仍實行計時工資的工人外，一律實行計件制。到七月一日計件工資制的工人將增加到百分之七十八，到年底增為百分之八十。

今年的集體合同，一般是號召廣泛採用累進制，此種制度在戰爭中首先實施，在許多首要的工業部門驅逐了普通的計件制。

在討論蘇聯的計件制時，一定要記着它基本上是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的計件制的。如果這種方法在蘇聯是爲了工人的利益的話，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它却是「趕快」，因此是對工人外加的負擔。

如果一個資本主義工廠的計件制工人在一個時期能使他所得的超過他的平均收入，

確定無疑地他的工資會很快地被減低。因為這一點資產階級世界的工人對提高勞動生產力不感興趣。因為他很清楚地知道歸根結底這對他個人或整個工人階級都沒有什麼好處。

那末在我們的工廠裏工資是否也修正呢？自然也修正，因技術的發展，生產組織的改進，生產規定額就不能不變。然而在蘇聯的情形下，工資的修正做法是不同的。首先，這裏的規定額一年只審查一次，這給了工人以充分的時間以適應提出的任何改變。而且，如無工會的同意就不能實行任何的改變，而工資只有在較高的產量規定是由於生產程序組織得好與技術改進而來，並不太消耗工人的體力時才同意這樣做。

經驗表明：蘇聯工人適應增加的生產規定額毫無困難，通常是一開始就能完成。在很短的時間內他們就開始超過，並使他們的所得加多。

三

由工人、工程師和技師們提出的合理化建議，在機器與開鑿機工業各工廠中提高勞動生產力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提高效率的計劃與建議的發明者都得到獎金。此外，計劃與建議的實現對發明的工人及其同伴都會增加收入。典型的例子是列寧格勒斯維爾德洛夫機器工具工廠的斯塔漢諾夫式的工人格羅莫夫。他發明了一種增加自己的生產力十四

情以上的方法。現在做同樣工作的其他工人也採用了格羅莫夫的方法，但是他們的產量規定額並非未因此而增加。根據蘇聯勞動法，由於合理化而修正規定額，不得早於發明或新方法實施的六個月，這樣給所有工人以熟練地掌握新方法的機會。

給合理化的建議以獎金，在每種工業中都有嚴格的規定。舉例來說，如果因實行建議所得的好處是一千盧布，提出這一建議的人就得到此數的百分之十二·五。所有工業企業都支付這種獎金，而實際上又增加了工人的平均工資。譬如莫斯科工具工廠，在一月份獎金就提高了平均工資百分之七。

衆所週知，在蘇聯沒有生產手段的私人佔有，因此就沒有剝削者，勞動力已不是商品，在我們國家內就沒有私人專有勞動。社會主義的顯著特點是：剩餘價值全部轉入社會，並用之於勞動人民——也就是生產它的人——的福利。在蘇聯工人所得的工資之外，我們還必須加上政府對病假、產假、每年的休假，免費教育與獎學金，國家對訓練的開支，免費醫藥與休息娛樂的設備，兒童組織的維持，以及對大家庭的津貼等費用。所有這一切又增加了蘇聯工人平均工資的百分之三十八。

在資本主義國家情況則完全相反。在那裏工人的工資是極端地不穩定，並經常受壟斷資本瘋狂的利潤追逐所威脅。成爲這些國家永久現象的失業，定期的爲不時發作的危機所加深，它可怕地減低了工人的生活標準與工資水平。如果我們把戰前美國失業的數字計算進去，則該國公佈的官方工資數字將減去百分之三十二才是確實的平均工資，而

在危機時減去的還要更多。人所共知，在今天資本主義的條件下，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工人難以找到職業。

尤有進者，失業者不僅不能參加生產，他們還是在業者的負擔，因為歸根結底還是後者償付維持無業者的費用。失業給社會造成多麼大的損失，可從齊斯所公佈的數字中看出來，他估計美國在一九二九——三三年的危機中損失了一萬萬個工作年（即一個工人工作一年的時間——譯者），這等於損失價值二千萬萬美元的生產。

四

在蘇聯沒有危機和失業。在這裏工資和國家供給工人的其他津貼都一直在增加。例如我們工會的會員，去年平均月薪比前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八。

使得工資增加如此迅速的原因之一，是蘇聯機器工具工人享有一切機會經過訓練改進他們的技巧。每個工廠都有為工人而設的免費課程，有的工廠甚至還有高級技術學校。工會在訓練工人的組織上起着積極的作用。

工會還有頗大的力量組織社會主義競賽。在我們的工業中差不多所有的工人都參加了這一爭取生產優異的羣衆運動，他們如整個的蘇聯工人階級一樣，保證四年完成當前的五年計劃。保證了勝利完成戰前五年計劃的蘇聯工人的愛國主義，是目前恢復與進一

步發展工業的有力因素。斯大林曾說：「……工人們覺悟到工作不是爲了資本家，而是爲了自己的國家，自己的階級，代表了發展與完成我們工業的鉅大的推動力。」

瞭解到是爲他們的利益而增加生產，刺激了蘇聯工人改進他們的技巧，向最好的工人學習，與更積極地生產。關於工人們如何利用生產最好的人的經驗，或者卓越的工人們如何幫助旁人達到自己的水平，我可以舉出許許多多的例子來。

工會與廠方對於工資問題的紛歧在蘇聯是非常之稀少的，因爲工人與經理有着相同的利益。此種意見紛歧的例子最近的斯維爾德洛夫州的阿拉巴葉夫斯克機器工具工廠，當地的工會委員會採取行動使廠方在一些部門採用累進計件工資制。工會貫徹了這一行動，新制度已經造成了更高的產量與工人更大的收入。

在我們工業中所實行的工資政策，如在蘇聯一切其他工業中一樣，既保護工人和僱員的當前利益，又促進技術的進步。這樣，它在蘇聯工人實現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全面努力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譯自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七日莫斯科新聞，達布拉哈塔夫作，程之平譯。）

精簡與節約

維利牛斯屠宰公司的職員雅可維辛同志寫了一封信給真理報，信中告訴我們，在該公司中存在着駭人聽聞的「秩序」。會計室裏現有十一個人在工作，而照編制表的規定是只能有七人的。沒有任何必要，成立了專門的「原料科」，一位採辦員在這兒高踞着動物飼養學學者的職位。雞鴨點收員不知什麼原因被列為「雞鴨廠廠長」，既然是廠長，當然也就是廠長的薪資了。俄國職工供給科的指導機構也是非常龐大的，三四人就能做好的工作，却堆了九個工作人員。

我們黨常以關心國家利益的崇高感情去教育蘇聯人民，所以雅可維辛同志，正如像蘇聯其他愛國者一樣，他不能對此種浪費的現象熟視無睹。

蘇聯部長會議國家人事委員會注意了雅可維辛同志們的警號，審查了維利牛斯肉類企業的人事狀況並縮減了二十六人而於事無損。更正確的說，對事情有了很大好處，因為這些節省下來的錢財對國家有很大用處，而這些縮減下來的工作人員，可以把自己的勞動放到真正需要他們的地方去。

這一事實說明了什麼呢？

首先，說明了：不管政府下了關於厲行節約與冗員現象作鬥爭，亟力愛護國家錢財等等最嚴格的指示，但在某些地方仍不計算錢財，破壞節約制度並給國家以極大損失。雅可維辛同志的信中所提出的不是關於某一部份的個別的現象。俄羅斯共和國最高蘇維埃最近一次常會的討論中也表明了，關於合理地和節約地使用人力的問題，是有很大的國家意義的。人事機構的改善，毫無疑義的，乃是給國家節省成百萬成千萬盧布的辦法。例如斯密爾諾夫同志在會上談到，潘靜省裏有着可觀數量的人員冗多的採購處，該省之「煙草原料總公司」半年中曾付出工資二十二萬八千盧布，而這一機關所製出產品才值六萬三千盧布。「鷄鴨工業」半年中領了工資三十二萬二千盧布，而出產之雞蛋、家畜、絨毛、翎毛等總值不過二十萬一千盧布。斯密爾諾夫在代表們哄堂大笑中說：「你們看，這個採購機關連絨毛和翎毛都算上也不能彌補自己的費用。」高爾基省的代表希錯主夫告訴說，在「高爾基城食品工業材料供給處」，「糖類銷售總公司」「罐頭銷售總公司」……這些供銷機關不是太多了一些嗎？代表極肯定地證明，高爾基省現有十分之九的供銷機關中，是可以撤銷其相當大的數目而無任何損失的。僅一高爾基省在這上面一年就可以節省五百萬盧布，並可調出上千的人來進行有益的工業生產工作。

這些例子說明，如果我們的經濟機關堅決地去研究改善組織機構，不保留多餘的人

員，減縮非生產的開支，我們是可以節省不少的錢財的。

斯大林同志在二十多年前曾這樣說過：「善於合理的，精確地實行開支，這是一門最重要的藝術，它不是一學就會的。」在這些年代裏我們的幹部已經學會了很多。貫徹經濟核算制度也曾使我們國家爲全國工業化的事業，爲農業集體化及文化建設節省了巨量的金錢。社會主義的經濟本身就其本質說來也是不允許浪費的。我國廣大的勞動羣衆已經參加了節約，盈利和社會主義資本積累的鬥爭。可是，即使現在，掌握最重要的技術——合理的開支金錢——的任務仍是最迫切的任務。人員冗多的例子說明了這一點，許多別的事實也說明了這一點。

就拿戲院開支的問題來說吧。直到現在，在國家藝術委員會管理下的劇院裏，還存在不正確的，極端錯誤的現象。他們各種活動經費的基本來源不是由售票得來的收入，而是國家預算中的津貼。更有進者，地方政權機關除預算以外還撥給劇院補充費，鼓勵他們坐吃山空和浪費。對於上演好劇，增加演出場數，更好的爲觀衆服務，劇院是毫不關心的。我們劇院如果好好的工作是能夠很快的走上自給自足的道路的，這一點，難道還有疑義嗎？

事實證明，如果照布爾什維克方式做事的話，很多的工業企業不要國家津貼，是完全可以維持的。莫斯科九個工廠經理上書斯大林，不要國家津貼的事實，在很多工廠裏得到了最熱烈的響應，決不是偶然的，這些工廠由於政府各部核算較寬，今年會計劃數

給部份津貼的。真正的經濟核算的實現，新技術的採用，勞動生產力的提高，生產的堅決實行機械化——這些都是提高我們企業盈利和增加資本積累的巨大泉源。政府各部和總局應深刻的檢討每一企業的經濟，並採取辦法使需要國家津貼的工廠數目逐月地減少。

財政機關、銀行、國家監察機關，政府各部的監察機構在這方面可以做很多的工作。事情不在於將自己的活動限於調查和造那些說明和登記已形成的損失或浪費的公文。應該不僅揭發那些對國家錢財抱犯罪態度的事實和最嚴格的處分那些犯罪的人，而且應該預防各種損失，不屈不撓地想法改善組織機構，發現節流之道。

我們的黨常常着重指出節約制度對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意義。現在，在實行貨幣改革後，節約問題就具有特別的意義。我們的國家現有十足價值的盧布，這種盧布越經濟地使用，它就越發鞏固。貨幣改革的成績是應該以我們在經濟中的節約來鞏固的。

黨的各級組織現在應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要使經濟工作幹部注意到節約問題，注意到產品的質量、成本、經濟核算等問題。要以對待浪費的布爾什維克的不調和性；細心打算，善於愛護國家的錢財，使之不受盜竊和浪費的精神來教育在國家機關中的一切工作人員。那時我們的國家將更加富足，能夠使經濟和文化建設達到更高的速度。增加資本的積累，給五年計劃四年完成造成新的可能性。（祖佑譯自三月二十七日「真理報」社論）

節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方法

德米特里·普琴科

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開啓了生產合理化和生產力不斷地、經常地迅速發展的無限可能性。

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和生產手段的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度構成了資產階級社會的經濟基礎。資本主義的經濟以及它的生產的無政府狀態，被自然法則所推動和受敵對階級的矛盾所摧折，按它本身性質說來，是一種浪費的經濟。

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使生產力的掠奪，和每逢規律性的生產過剩的危機重現的時期中，大批人類勞動生產品的破壞成爲不可避免現象。它引起那些侵略的、不義的戰爭。這戰爭帶來了空前所未見的領土的破壞和荒廢，毀滅了數百萬的人類勞動的創造物。它爲了滿足資產階級的窮奢極慾而任意浪費生產力。

資本主義的經濟的目的不在滿足勞動者的需要；它的商品的生產是爲了增加資本家的利潤。資本家爲了利潤而經常努力追求生產費用的最大的降低。而這樣降低的方法不論怎樣巧妙，它歸根結底，必然加強了對資本的僱傭奴隸的剝削，降低了工人的生活水

準而增加了失業者和貧困。

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以它的生產手段的社會公有制，對經濟方面做有計劃的指導，所以它本質上便消除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恐慌和失業，從而——在嚴格遵守社會主義的經濟方法的條件之下——也消除了生產力和人類勞動生產品的掠奪了。

經濟上的社會主義的有計劃的領導對於引導一切國民經濟資源進入生產，對於這些資源的最大經濟與合理的利用上，啓發了廣大的可能性。

自發而盲目地支配着資本主義經濟機構的，引起社會生產力的大量浪費的價值法則，一到社會主義的社會裏，便變了樣。它變成了計劃經濟的工具。價值法則對於社會主義計劃的服從，和正確而自覺地利用它作為計劃經濟的工具，這事，在減低生產費用和節省人力的與物力的工作上，有了極大的可能性。從而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以較少的物質和人類勞動而創造較多的生產品這事便大見可能。它本身包含着為全力加速生產的增加並增殖社會的財富，以提高人民物質上的幸福和全面發展社會主義文化的一切必需的條件。

節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方法。列寧和斯大林經常地強調教育蘇聯人民節省社會的物質，對一切方式的浪費公共財產的不妥協精神的必要；他們教訓大家細心地處理社會經濟，毅然排斥不合經濟的情形，保護社會主義的財產不受任何侵害。

節約在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新的技術基礎上改造整個國民經濟方面負着重大的

使命。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工業化的實施是以殘酷的剝削人民，劫掠殖民地、賠款、借外債等等為手段的。蘇維埃國家當然不能走這一條路線。它的實施社會主義工業化所賴的是國內的資源，而最經濟的利用它們。斯大林在總結第一次五年計劃時說：

「確立最嚴格的節約和積蓄，對於我們國家工業化所必需的財源——這便是要達到建立重工業和實現五年計劃應採的路線。」

「勇敢的任務嗎？艱難的路線嗎？但是我們的黨正因為它沒有權利畏懼艱難，所以叫做列寧的黨啊。」（見「列寧主義問題」俄文版三七二頁）

列寧與斯大林的關於最嚴格的節約的指示，對於斯大林五年計劃時期國家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計劃的實現上，是有最重要的意義的。

在偉大的祖國戰爭的年間，蘇維埃國家靠了節約，才能在動員物質和金錢以供戰爭需要的方面獲得了顯著的成就。

在最近的時期中，最嚴格的遵守節約的任務在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切部門裏，帶着新的力量出現了。戰後的五年計劃包含着復興與受到法西斯德國侵略者蹂躪的區域和經濟的與文化的將來的建設上的龐大的計劃。

五年計劃提出這樣的任務——保證一切國民經濟部門中往後技術上的進步作為生產的有力的增長，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和國民經濟裏今後生產費用與經濟的降低的條件。

蘇聯一九四六——一九五〇年國民經濟的復興和發展的五年計劃的法律要求：

「……增加經濟組織對於國內資源的動員，對於節約和斷然消除因不經濟不生產的支出而生的損失等的注意。」我們當前的任務是：徹底利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一切可能性來廣泛地實現所有經濟的與文化的生產部門中的節約，並加緊我們發展的速度。

去年新的斯大林五年計劃的第一年計劃的完成達到了很大的成功。一九四六年內，蘇聯的工業大體完成了工業生產的戰後重建，一切工業的生產品總額在日用生產品方面，一九四六年比一九四五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蘇維埃人民成功地克服了蘇聯許多地方的嚴重旱災的惡果。這一年內，在蘇聯貿易的發展和財政與貨幣流通的鞏固方面有不少的成就。

斯大林五年計劃的第二年工作計劃更為龐大。一九四七年的蘇聯國家預算的法律和部長會議的關於復興發展一九四七年的蘇聯國民經濟國家計劃的決議，都規定大規模進一步發展國家的國民經濟與文化措施。問題在於如何能更經濟地與樽節地利用物質的與金錢的資源，並因此而加速經濟建設的速度。

我們的國家盡一切可能以求因淪陷而受損害的地區迅速恢復工業，運輸與農業，加快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速度。

國家經濟發展的迫切需要促使恢復了的和新建的工廠、礦場、熔爐、馬丁爐等能更快地開始工作，責成結束建築上的材料的浪費。目前，破天荒敏銳地提出了一種與損失作鬥爭的任務，這損失是國民經濟因物質、特別是設備的被凍結而蒙受到的。例如衆

所遇知的，在建築所和企業裏，堆積了許多沒有規定的器材。國民經濟有正當理由要求建設家加緊使新的力量開始工作和增加生產品的出產。

為求高速度發展的保證必須也着重更好地利用已開工的設備。這裏有着多量的預備品。譬如在頓尼茲礦區，在一九四六年年底，差不多有百分之三十的鑽鋸機器，百分之二十二二的傳送機器百分之二十六的電氣運輸車都沒有工作。頓尼茲礦區的鑽鋸機的生電力平均每月還不足二千一百噸。

設備的充分利用，是與企業裏的勞動的準確的組織，和它的最大合理化地與經濟地利用二者直接關係的。

在計劃充分使用設備方面，有許多的企業往往採用所謂平均標準的有害的習慣，這種標準是以較低下和落後的指數為依據的。

新的斯大林五年計劃產生了社會主義生產的新的英雄們。普遍知名的機械工蓋拉辛·扎布羅什茨使鑽掘機的煤的生電力月達一萬五千噸。鑽掘機工人費奧道爾·齊及耶夫在一九四七年一月裏掘了一萬六千噸以上的煤。

向前進工人看齊時，煤的生產不但可以完成政府在一九四七年所規定的每架鑽掘機平均每月開採三〇五〇至四七五〇噸的生產標準，而且還可以超過它。

節約的最重要的源泉是材料、原料、燃料和電力的節省。我們的工業具有實現這種任務的巨大的可能性。例如，在金屬製造工業裏，改換各樣零件的刻印，取消堅固料的

不需要的儲藏，在壓力下鑄造等等的辦法，可以節省幾十萬噸的金屬。只要舉出這樣的例子：「在赤色無產階級」車床製造工廠裏，改換約八十樣的零件刻印，這一項生產就節省了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的金屬，而勞動生產力也增高了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

節約的另一重要源泉是生產的合理化，工程技術方法的改善，生產制度的加強。在這方面，我們的許多企業已獲得了很重要的成功。

跟生產裏的缺點和不生產的消耗作鬥爭，對於成功的實現節約方面，有着很大的意義。事實說明在許多企業裏缺點還是很多很大。在農業機器製造部裏的企業裏，由缺點而損失的在一九四六年的十一個月裏，達二億一千五百盧布，而不生產的支出達一億三千二百萬盧布。若干經理人員顯然不知道國家因生產的缺點而受了很大的損失。用加強生產的與工程技術的紀律，更妥當地使用設備和材料，以及提高工人的素質等方法來清除缺點也可增加生產品的出貨，為國家節省了數億的盧布。

節約需要物質的動員和不能容忍物資財富的僵化。例如有色金屬冶金部的波谷司洛夫斯基鋸工廠的建築時，物質的儲藏在一九四六年的九個月裏增加到一千萬盧布，但按計劃他們只需增加到五十萬盧布。在這建築裏擱置着它所需要的價值三百萬盧布的二百六十五架起重機，它們還是一九四四年運進去的。

另一個糊塗的經理人以接收更多的材料，儲藏起來為得計，一藏好幾個月或幾年，却不管規定企業儲藏的材料是生產上所必需的東西。這裏一來，多消耗了許多國幣。這

些人的這樣做法使物質僵化，延緩它們的週轉，因此延誤了生產的進程，使企業的財政經濟紊亂，引起很多的損失和不生產的消耗。

節約要求行政管理機構的合理化與完善化，清除它的不必要的小組，減少職員，並騰出勞動力來從事生產，減削企業裏、運輸裏、貿易裏行政管理費和雜費，以及誇大的報告。蘇聯一九四七年的預算規定減編行政管理機構的數額和它的維持經費。

節約的基本指數是減低生產品的成本，提高企業的工作收益，確立經濟的計算。企業的工作的標準的領導要求它的領導者，懂得生產的經濟、財政，懂得每個製品按成本的基本原素——工資、原料、燃料、電力、折舊數與管理費——計算的實際用費。

蘇聯部長會議指出航空工業部、運輸機械製造部沒有實行政府的關於清除不生產的消耗，減少缺點和關於不得過多支出工資與材料的決議；並責成那二部在它們的企業與建設裏實施最嚴格的節約。

問題在於以全部毅力來實行政府所規定的減低工業生產品的成本，減低建築的費用，鐵道、水道，航空運輸的成本，減低流通的費用等的計劃。

節約的本身把國家的利益和各個企業的，也和工人的工程技術，工人的與企業領導者的私人利益結合在一起，企業組合越優良地、越經濟地、越節儉地工作，它獲利也越多，它的工人們在物質上的鼓勵的根據也就越大。

業務處理的紊亂、浪費，材料的保管與登錄的無秩序都可以使節約方面的一切措施

變成徒勞之事。事實證明物質財富的損失還是很大。有些怠慢的經理人員顯然忘記了托付給他們的國家財產，他們保管這些財產是對國家和人民負着責任的。

節約不能自動地進行的。它的每一點的實現需要堅韌、毅力和在蘇聯經濟的每一環節中爲了樹立社會主義的經營方法而作的有系統的鬥爭。爲節約而鬥爭，一方面需要黨組織在企業中的真正的創導性和布爾什維克的英勇；另一方面需要經營人員在生產的領導中經常改進。

「我們有些經理人員至今還不懂得列寧和斯大林不斷說起的節約，它並不是一種短期的運動，而是社會主義特有的經營方法。蘇聯人民必須永遠記住這些指示，並且毅然拿它們來做自己工作的指南針。」（日丹諾夫語）

蘇維埃人民視國家的利益高於一切。爲完成和超過計劃的鬥爭成爲蘇維埃人民的高貴的傳統，他們以極大的熱誠接受了復興與發展國民經濟的斯大林五年計劃。爲完成這個計劃，蘇聯人民必須克服不少的困難。蘇聯人民在偉大的列寧——斯大林的黨的領導之下，爲了更迅速地實現規定的計劃——它的成功關係着社會主義國家的此後經濟力量的鞏固和人民幸福的增進——越來越大地發揮着自己創造的能力。

澈底地和堅決地實施節約時，蘇聯人民就可達到爲實現戰後五年計劃的偉大任務所需的源源不絕的新儲備材料的發現和動員了。

社會主義競賽是全國經濟文化高漲的有力槓桿

A·柯爾斯基作

十八年之前，聯共（布）黨第十六次全會號召蘇聯的一切工人和農業勞動者，展開爲完成第一次五年計劃的社會主義的競賽。提出實現五年計劃而鬥爭的競賽時，第十六次黨的大會強調了，那克服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障礙和困難的工人階級的羣衆創造性的意義。第十六次黨的大會號召組織一切建設部門的競賽，工場的、礦場的、鐵路的、國營農場的和集體農場的競賽。

如第十六次黨大會的文告的指示，喚醒羣衆創造力和創造性的競賽，必須成爲將勞動者引入社會主義建設的經常的方法，它必須引起社會的和國家的組織，首先是勞動組合和經濟機關的工作形式和方法上的改進。

社會主義勞動的偉大的創造力還在第一批星期六勞動者（這是勞動階級的偉大的先驅）身上爲列寧所發現的，列寧和斯大林關切地支持了工人階級的勞動創造性的各式各樣的表現。列寧——斯大林的黨培養和教育與打破陳舊的標準和表現出勞動的高度生產力的模範的那些生產改革的優秀幹部。

據斯大林的定義，社會主義的競賽「是那個槓桿，工人階級用了它來實現把國家的一切經濟的和文化的的生活轉換到社會主義基礎之上的使命」。它的特徵是新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不受剝削的勞動者間的合作和社會主義的互助的關係，社會主義競賽與蘇聯的國民經濟計劃是分不開的，而且是實現我們計劃的最重要的基礎。

競賽的偉大力量在斯大林五年計劃的時期中被完全發現。成百萬的工人和集體農民的羣衆的積極性，獻身精神和創造性變成了國民經濟飛躍發展的有力的因素。

在社會主義的勝利和新技術的創造的基礎上發生了社會主義競賽的最高形式——斯達哈諾夫運動，這是「現代最生動和不可克服的運動」（斯大林語）。在斯達哈諾夫運動中斯大林天才地發現了勞動階級的文化技術的高漲的萌芽，這種高漲便可保證勞動的高度生產力和消費物品的豐裕，這是從社會主義轉變到共產主義的必要的條件。

在偉大的祖國戰爭期間，工人，集體農民和蘇聯知識分子因實現戰爭與經濟的任務的社會主義競賽而保證了後方工作的成功和對戰線上軍火糧秣的供應的源源不絕。戰時的斯達哈諾夫運動者的鮑舍依·楊金·薛米服洛斯·羅寧·瓦列耶夫，奧卡爾高夫和其他的人改善了生產工作的方法，發明了增加勞動生產力的新的可能性。

蘇聯人民從事解決戰後復興並更進一步發展國民經濟的任務時，用新的力量展開了社會主義的競賽。

爲完成新的斯大林五年計劃的全民鬥爭已經獲得了本身的成果。工業方面大體上已

完成了戰後的重建。日用生產品的生產在一九四六年較上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在一九四七年的第一季，尤其在四月時，日用生產品的出產仍繼續往上增加。鐵路每日的平均裝載量一九四六年較上一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三。在農業方面，春耕的準備上所實施的標準較上年為高。集體農場的農民成功地實現了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二月全會通過的農業增產計劃。

蘇聯人民在新五年計劃的第二年中，正為着加快恢復並發展國民經濟，為最迅速地克復戰後的困難而鬥爭。

社會主義競賽以先期完成新五年計劃中第二年的計劃來慶祝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三十週年，這競賽的特徵首先在於規模的廣大。為響應列寧格勒人民的號召，參加競賽的包括有煤炭工人、石油工人、冶金工人、製造機器工人、化學工人、和其他工業部門以及建築的工人。由於阿爾泰地方的集體農民的倡導，展開社會主義農業勞動者間的社會主義競賽。在許多寫給斯大林的信裏，烏克蘭、白俄羅斯、喬治亞、暹班、西伯利亞、伏爾加流域、莫斯科州和蘇聯其他的共和國和州的集體農民和一切農業工人都願在本年內負責達到高額的收穫和公共畜產的提高。對於集體農村裏羣衆競賽的開展的有力的推動力是政府所訂的，集體農民和耕種機站與國營農場的工人因高額收穫而獲得社會主義勞動英雄尊號和獎予勳章或獎章的辦法。

在戰後時期的大規模社會主義競賽之下，它的特徵是對於利用個別的工業企業、集

體農場、國營農場、耕種機站的預備品的那種具體的和差別的處理辦法，這允許了廣泛地利用最好企業的經驗並可把落後的引導到前進的水準上去。

現階段競賽的最重要的特點在於新的男女工人幹部的加入，他們都是在戰爭年間或戰爭終了以後參加生產的。在全國都已知名的煤炭工人蓋拉辛、扎布羅什茨，女織工瑪利亞、伏爾高娃亞，鞋匠瓦西利，馬特洛索夫之外新進了許多戰後五年計劃的斯達哈諾夫運動者。其中如頓內茨礦區的鑽掘機械工尼古拉、烈索特那克，他達到了頓內茨礦區的鑽掘機的最高生產量；克利佛羅伊的石油鑽鑿工伊凡·柯察考夫斯基，他是開礦鑽孔的新方法的創導者；北烏拉爾的鉄鑿礦的鑽掘工班長伊凡·普洛尼乞金是鑽掘工作的特快方法的創導者之一；拚組工人伊凡·羅米央采夫「是扎布羅什煉鋼廠」建築時用快速的拚組方法的創導者。

社會主義競賽的現階段的特點是各經濟部門之內和各不同部門之間的前進工人的經驗的迅速之傳播。光輝的實例如北烏拉爾鉄鑿礦的最優秀的鑽掘突擊工人的成就（比平常的速度要快好幾倍）之被廣泛地採用。前進的鑽掘工人的成就在短時期內不僅成了北烏拉爾的資產，並且還開始傳播到其他重工業部門裏去了。

蘇聯部長會議不久之前通過了，關於組織以北烏拉爾鉄鑿礦的鑽掘工為首的，包括有色冶金業、黑金屬冶金業、煤炭工業、燃料企業建築、建築材料工業、化學工業在一起的鑽掘突擊工人的全蘇聯的社會主義競賽。這可使為一切國民經濟的增長的基礎的重

工業的重建和發展顯著地加快了起來。

從斯達哈諾夫的紀錄迅速轉到許多工人的高指數這一件事在玻璃工業裏已經成功地實行了。在「富爾可」機器上拉製玻璃片的加倍的速度已經是里加的「沙爾坎達烏喀瓦」工廠的基本指數了。

在許多企業裏由斯達哈諾夫運動者和前進的工程師的發起，制定了按斯達哈諾夫的勞動方法的計劃。這些計劃的完成保證了勞動生產力的新的顯著的提高。

因社會主義競賽的結果，各企業，各車間和突擊隊所達到的前進的經濟技術的指數，成了規定國民經濟各不同部門的平均增進的標準。政府用訓令各部廳的方式規定了一九四七年的新的經濟技術的標準，使各種企業制訂差別的任務來應用那保證超過國家計劃的那樣設備，原料和器材。現在規定標準的工作在國民經濟的大多數部門裏已經完成了。

社會主義的競賽的成功多半要由生產指揮者的領導作用的努力與否來決定的。現代社會主義的企業是種複雜錯綜的生產機構。人們協調的和生產高的工作的組織和技術的最有效的使用都要靠企業的領導人才。斯達哈諾夫運動者們和工程師們的精誠合作正是生產的先驅者的成就之迅速推廣的保證。頓內茨礦區的鑽掘機械工人尼古拉·烈索特那克在三月裏達到超出規定生產品標準四倍以上，他這種成就大半須歸功於這區的主管勃里契珂，因為他會調整熔岩裏的循環工作。北烏拉爾鉄鑛礦裏迅速的鑽孔工作是在工

程師和技師們以及礦場領導人員的積極參加之下傳播出來的。烏拉爾的基洛夫工廠的曳引機零件製造方面的工人的勞動生產力增加兩倍多是廠裏的工程技術家亞歷山大·伊凡諾夫創導改善了工程技術方法的成果。生產力的廣泛的機械化，狹隘場所的清除，企業的合拍的工作都有賴於企業裏的工程技術工人和領導人員的。

斯達哈諾夫運動者的成就的推廣在許多場合要由個別經濟部門的協調的工作來決定的。例如大家所知道的，現在成功地展開了「ГОГО」曳引機的大量生產的烏拉爾的基洛夫工廠，因鄰近企業不及時供應各項零件而發生了阻礙。「巴黎公社」集體工廠因皮革原料和半製品的不湊手妨礙了應負責任的完成。

社會主義競賽的將來的發展，部方對個別企業的指導，黨組織在競賽裏的組織任務上的強化，都會使生產預備品更充分地動員起來，並且由此保證了新的斯大林五年計劃的順利地完成和超過原計劃。

社會主義的物質鼓勵

布勒格

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辯護家們平常總說，只有這種制度才能創造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和保障社會經濟進步的物質鼓勵。相反的，他們認為好像社會主義把這些鼓勵都一掃而光了。在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們的著作中，最愛採用的反對社會主義的理由，就是肯定說似乎社會主義制度只有一樣的工資，不重視人們的各人物質利益，因此不能向前推動社會的經濟發展。

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經驗已經十分清楚地駁倒了這些奇談，證明社會主義制度絕對消滅個人的物質鼓勵，而且利用這種鼓勵並導入新的道路，把個人與社會的利益正確地結合起來。當然，如果認為「物質的鼓勵」不過是不顧一切的追求利潤，無視整個社會的利益，那末，這一類的「鼓勵」是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無關而且敵對的。然而每一個頭腦健全的人都明白，不能在物質鼓勵和資本主義「進益」之間放一個等號。

「各盡所能，各取所值」，這原則是社會主義的基礎之一。

一方面。這原則是說社會主義社會的每一個人員應當視自己的才能，用個人勞動使自己的貢獻併入經濟與文化建設的總事業，另一方面，每個人也有權得到相當於自己勞動數量與質量的報酬，社會主義社會人員的勞動報酬，基於上述的原則，創造出了增加國民財富的有力的刺激，同時促進了勞動者的物質與文化水準不斷的提高。

社會的基本生產力是人，是生產工作者，他們使用工具與機器，用自己的勞動創造物質價值。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不僅保證充分利用這種生產力，並且鼓勵每個工作者盡量地和最好地爲了他自己的利益，也爲了整個社會的利益，而利用他的全部才能。

工資制度便是蘇聯國營企業中所採取的物質鼓勵工人的方式。因此，這種制度之建立是爲了鼓勵工人們提高自己的勞動技能和生產力。

社會主義與工資均等制完全無關。在社會主義社會中還保存着熟練勞動與非熟練勞動間的差別，這些差別，在訂立各種不同的職業與專業的工人工資比率時，蘇聯會加以考慮。熟練工人的工資在蘇聯高於非熟練工人的工資，因此工資的標準是按照工人技能經驗的高度而累進增加。這種技能不同的勞動的差別工資，鼓勵工人去提高文化技術的水準，去求得更複雜的專業和職業，蘇聯爲了這種事情準備了一切的條件與可能。工人們提高自己的利益和整個社會主義社會利益正確的結合，工人們在提高自己的技能後直接感到物質的結果，社會主義的社會則爲了盡量提高生產和最好利用進步技術而需要增加熟練的幹部。

在資本主義之下，同樣存在着熟練工人與非熟練工人工資上的差別，然而這種差別是自然形成的，並且和商業情況的條件分不開。經濟危機到來的時期，就顯出熟練勞動力的需要大為縮小，熟練工人的工資也減少到和他們技能不相稱的水準。在資本主義的環境裏面，熟練的工人永遠不敢相信他可以保持自己相對高度的工資，他不會從較有技能的勞動上轉移到較少技能的勞動上，甚至於不敢相信他不會失業。相反的，社會主義制度消滅了失業的危機，保證熟練的工人一定有高的工資，而且比資本主義更廣泛地創造提高技能的物質鼓勵。

蘇聯使工人的工資因他們技能而差異的時候，同時它也守着不論工人屬於何種性別，種族和民族，凡同樣技能的勞動即獲平等工資的原則。

在其他的國家中，男性的勞動所得高於女性，那怕男女工作技能是一樣的，而在蘇聯，規定工資率時，沒有，也不會有，因性別，種族，民族的屬性等而發生的某種差異。況且同樣技能的男性與女性的勞動工資平等，這就是吸引女性參加生產和在女性羣中培養熟練工人幹部的重要的物質鼓勵。

社會主義的各取所值的工資原則，不僅意味着熟練與非熟練勞動的差別工資，而且也意味着有同樣技能的不同工人的工資水準與他們勞動生產力的水準有關。後一種是用計件工資，特別是用計件累進工資的方法來實現，這兩種工資制度在蘇聯廣泛應用着。後一種方式建立了按工人超過的工作量累進增加的差別計件工資。這一種不同生產力的

勞動差別報酬，對工人發生了提高自己勞動生產力的物質鼓勵。

當然，物質鼓勵不是鼓舞蘇聯工人努力增加生產品的唯一要素。工人意識到他們用增加自己工作的方法可以促進社會主義祖國社會財富的增長和經濟的發展，這種意識在鼓舞工人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進步的工人——斯達漢諾夫運動者對於社會福利的自覺的關懷，並沒有完全排除了他們想提高自己個人財富的希望。在某種場合中，個人的利益並不與社會的利益矛盾，反而是和諧一致的。

對於工程師和管理人員，引起他們發揮自己本人的工作和他們所領導的企業工作的物質鼓勵，反映在獎金制度中。各工廠如果完成了或超過完成了生產計劃，除了他們因為技術的程度與工作的數量而應得的固定收入以外，還有獎金可以領到，所以蘇聯精神勞動的工作者也是受着物質上的鼓勵去達到他們工作中的最好的數量與質量的指數。

同工人階級和知識分子一樣，蘇聯的農民們也受到提高自己勞動的技能與生產力的物質鼓勵。這是在集體農場的成員之間按勞動日的數量分配集體農場收入的方法來實現的。他們獻贈國家和在市場上出售以外剩下來生產品，他們對國家繳納所得稅和用去擴大未來生產以外餘下的現金收入，就根據每個人所做的勞動工作日的數量在集體農場員間加以分配。「勞動日」同時也就是集體農場員的勞動尺度和消費尺度。一個集體農場員做完了農場中的某一項工作，計算為一定的勞動日的數量。而且一天的工作可以因為勞動的複雜性（更熟練的勞動需要更多數量的勞動日）和勞動的實效，表現為不同

數量的勞動日。例如，一個集體農場員去開墾或收割了許多公頃的土地，即使工作的日數是一樣的，如果他做的多，計算下來他實際消耗在這工作上的勞動日也多。因為這種原故，技能不同的勞動的差別工資原則，和按照工作量的計件工資原則，就應用在集體農場中，使集體農場的工作人員感到物質的鼓勵，提高他們的技能和增加生產量。

爲了高度的勞動生產力而支付的追加工資，對於促使集體農場增加生產的物質鼓勵生產起了很大的作用。集體農場員們和集體農場的工作組凡在農作和畜產上達到了高度的指數，就得到超過他們基本勞動日數量以上的追加工資。

所以，社會主義絕不無視個人的物質鼓勵，然而儘一切方法利用它們，使之爲社會主義的經濟服務。社會主義社會的工人們樂於工作得好與生產得多，是因爲他們把這看作繁榮自己祖國的任務，也因爲這直接助成他們自己物質財富的增長。

集體協議是組織勞動高漲的重要手段

V·庫茨涅佐夫

蘇聯的勞動組合在部長會議贊助之下照往年成例從三月起與工業界，運輸界和建築界的企業的管理處着手締結集體協議。

集體協議應該成爲工人，工程技術勞動者和職員等廣大羣衆在解決黨和政府提交我國人民的偉大任務的鬥爭裏的創造性活動的組織手段。

在戰爭年間和戰後時期，企業裏的工人的成份顯著地更新了。在工業和運輸方面加進了許多新的青年工人，他們都是初次參加生產的。需要有人幫助他們迅速獲得社會主義勞動的經驗。集體協議在這方面對於他們有很大的用處。

在我們國家裏，人們的勞動不是爲了資本公司，而是爲了自己，爲了自己的社會主義國家，爲了全體人民的幸福：勞動成了光榮的，剛強的和英雄的事業。蘇聯人民以自我犧牲的勞動幫助我們的祖國爭得對不共戴天的敵人的全盤勝利，並從戰爭的艱苦的考煉裏成爲更強大更受鍛鍊的國家。

我們國家的勞動者明白知道工業越好好地完成國家的計劃，它的生產品越出得多，

那末滿足人民需要的商品供應量也越多。勞動者的物質生活狀況的改善是和整個國經濟的增長，和我們的工業的與農業的發展分不開的。勞動組合的組織應該把這件事經常向工人和職員尤其要向那些初次參加生產的工人們解釋。

有廣大羣衆參加的集體協議的締結和對協議中規定的義務的有系統的考核，無疑地可以提高工人們的積極性，幫助展開對於生產組織、勞動、工資等方面和對於工人與職員的生活和文化的設備的缺點方面的事務的批評，並迅速地消除這些缺點。

黨在它的決議中屢次強調集體協議的重大的意義，指出它是吸引一切工人和工作人員爲完成和越過國家計劃而作積極鬥爭的重要的組織手段。第十六次黨大會的決議中要求在工人的集會上，對集體協議中最重要的部份作廣泛地討論。第十六次黨大會的決議中說：「集體協議只有在被一切參加它的團體成員的廣泛地討論的過程中。每個工人才明白其中規定他們工資高低和必須完成的任務的條款。只有在集體協議制定時以及它締結的整個過程中成員的自覺的參加，既使一切工人熟悉了自己的生產狀況和它在國民經濟的一般系統裏的任務，同時更對基於集體協議雙方的義務上的生產與聯合的堅固的紀律的實施給與了所必要的前提條件。」

集體協議——這是管理處和作爲工人集團的代表的工廠裏勞工組合的委員會雙方的義務。在我們的社會主義的國家裏，在工人與經理之間沒有也不可能有的階級的矛盾的。我們的集體協議和資本主義國家（那裏的工人不得不向企業資本家作反對減低工資，延

長工作時間，保持自己的生活水準和防禦被剝削的鬥爭）的集體協議根本上的差別就在這個地方。在我們這方面，締結集體協議的雙方代表同屬一個階級，並且都追求着共同的目標，即：儘量擴大和推進社會主義的生產，提高勞動的生產力，而在這個基礎上改善勞動者的物質的享受和文化的水準。

在斯大林簽署的部長會議的決議中指出：係用締結集體協議的目的在於保證生產計劃的完成與超過，勞動生產力進一步的發展，勞動組織的改善，以及提高經理部與勞動組合組織在改進勞動者的物質生活與文化設施的條件方面的責任。

勞動組合負有重大的組織教育的工作。爲了完成並超過五年計劃必須顯著地提高對一切部門的每個工人的工作限額，號召每個工人，工程師，技師與工作人員認真地完成課予他們的義務。集體協議無疑地將促成勞動紀律的加強，幫助進行對貪婪者與怠惰者，對那些供獻給國家的有利工作很少而只想拚命抓錢的人的鬥爭。

第十六次黨大會的決議中指出：在簽訂集體協議以達到改善工人的，首先是工業無產階級的，物質與文化生活水準狀況時，應該以發展全盤國民經濟（工人國家的經濟）的利益爲出發點而最注意地研究產業的企業組合，經濟聯盟，與企業等的情況。

「在簽訂集體協議之下，勞動組合必須堅決地排除管理機關方面的官僚主義分子和勞動組合組織方面的狹隘車間主義與職工會主義的傾向。

集體協議既是勞動組合組織與經理組織雙方的義務，所以它的一切部份不僅應由經

理組織來完成，也應當由工人團體組織實際地來完成的。」

第十六次黨大會的這些指示在目前具有重大的意義。

我們國家已經跨進了新斯大林五年計劃的第二年。一九四七年在蘇聯人民之前有着新的偉大的任務。爲復興被德國侵略者蹂躪過的區域並達到工業，運輸與農業往後的增長，必須趕緊大踏步前進。

我們具有完成這些任務的一切可能。龐大的貯備品隱藏在農業中。應該把它們動員起來，探求提高勞動生產力的新的可能性。

集體協議首先應當包含有行政機關與作爲工人團體代表的工廠中勞動組合的委員會雙方關於完成與超出國家的製造生產品的計劃的責任。一九四七年經政府批准的任務兩方都受約束的。行政機關和工人委員會並且應該以下述爲出發點，即：政府規定的計劃是最低的任務，它可能而且應該超過的。

重大的注意必須加之於：保證勞動生產力的發展的方策的擬訂與實施；關於消除損失和不生產的消耗的問題；一切工人的製作標準的履行；解除妨害個別工人履行製作標準的原因；消滅工作停頓。在集體協議，應當包含採用和傳播前進的工作方法的雙方的義務，幫助落後的工人，把他們帶到前進的水準上去。

在集體協議中應該加進關於加強企業裏發明的和合理化的工作的項目，採用發明家合理化的建議並給他們以技術上的幫助，也同樣幫助工廠裏的工程技術工人從事科學研

究的具體義務。

擬訂 討論集體協議時必須使工人，工程師，生產裏的隊長注意於支用原料與材料時的嚴格的節省，減少生產的廢棄料和加強對於缺點的鬥爭等問題。因為在許多的企業裏因缺點而損失的非常大，所以這問題就重要了。

集體協議的締結無疑地會引起企業中社會主義的競賽的新的高潮。工廠委員會應當以集體協議的條件為根據來組織車間的、班的、突擊隊的，以及個人的職業的競賽，並保證競賽的公開，鼓勵它的勝利者。

由列寧格勒人民和頓巴斯的礦工的倡導，目前以新的力量展開了鑽掘工、坑工、紡織工的競賽，以及不屬同部管轄之下的同性質企業間的競賽。勞動組合的和經理人員的組織必須支持這種倡導。

★

★

★

大家知道，對於勞動工資的任何改變都由政府決定。這一個程序在締結集體協議之下也是有效的。可是管理處和勞動組合的組織對於工資方面不要因此而不做一事。他們的任務在於創造增進勞動生產力所必需的條件，於是因此而提高工資。所以在規定集體協議的任務時，首先必須注意企業裏的工資的製額支付系統的儘量擴大，這是促進生產力最高度增加的辦法。

目前企業裏和部裏的勞動標準很低落。工作的經驗統計的標準佔着優勢。在工作機

械製造部的各工廠裏，依據技術的標準總共只佔百分之五，在機器製造和用具製造部的工廠中只有百分之十，在電氣工業的企業裏——百分之二十。重機器製造部規定一九四七年實行以技術為根據的標準也不過佔一切標準總數的百分之三十四，還以為這是大的成就。

經驗統計的標準的優勢會引起『有利的』與『不利的』工作出現，發生出熟練工人與不熟練工人的工資的均等，妨礙了勞動生產力的增長。這會常常引起這樣的事：極大多數的工人都顯著地超過了製造的標準，然而企業的生產計劃還是沒有完成。這種情形，譬如說在許多紡織工廠裏就有。這種情形不能讓它再存在了。

按三月裏政府的決議，許多部的製造標準應該向擴大方面修正。這樣的標準應當刺激勞動生產力的增加，不斷地驅使行政機關和工人改善工作，樹立技術的最新的成就，改進勞動的組織。

在集體協議裏也應該找到勞動保護，安全技術，減少患病率和傷殘以及企業裏勞動的一般的衛生設備條件——這是提高勞動生產力的重要的因素——等問題的反映。

為現有的與新成立的企業養成工人的與工程技術工人的幹部的問題在集體協議中應該佔有大的地位。這些問題裏的嚴重的責任是落在行政機關和工廠集團雙方的身上的。它們必須在集體協議中切實規定。

工人和職員的生活的改善，流動性的減少和企業裏的幹部的加強大半要靠住宅問題

的成功的解決——要靠新住宅的建築和現有住宅的修理的計劃的執行。然而一九四六年的住宅建築計劃沒有完成，而政府所分配的材料很多沒有應用。一九四六年的住宅建築計劃所有各部都完成不到百分之五十八，有幾部更糟。

政府批准了規模比一九四六年住宅建築計劃超過兩倍大的一九四七年的住宅建築計劃。在城市和工人新村中一九四七年應當動工的住宅面積有一千三百八十萬平方公尺。這是黨政府和斯大林個人的關於改善工人和職員的生活狀況的極大關心的所在。必須採取一切方法來無條件地完成這一個計劃。

在企業的集體協議中必須包含的不但有公共住宅建築和住宅修繕預備金的支出款項，還必須有建築對象的具體的綱要，主要的與目前的修理，以及對於私人建築予以幫助等。

★

★

★

集體協議的締結是最重大的政治經濟的措施。勞動組合的組織和經理處團體對於這項工作的處理必須鄭重準備，並且須在政府核准的限期內，完成集體協議的締結。

集體協議的樣本應該作為政治經濟的文獻而它的內容應該符合黨與政府在一九四七年向國家提出的任務。

集體協議應該提到工人與職員的生產，勞動和生活的最緊要的問題。工廠委員會負有保證企業裏的工人，技術工人和職員的普遍與積極的參加討論集體協議草案的事是完

全可以瞭解的。不在工人和職員的會議上討論的集體協議，這就不是協議，而這官僚的公事這樣的「集體協議」誰都不需要的。

締結集體協議是一種廣大的，羣衆的，政治經濟的運動。每個企業的車間裏應該設立小組研究個別的問題：提高勞動生產力，加強勞動紀律，吸收新的生產技術，改善勞動保護與安全技術，改善工人與職員的物質生活狀況和文化設施。

在會議上討論集體協議的草案時應該注意地傾聽工人和職員們的一切意見並且保證一切對草案的修正與補充作廣泛的討論。只有在這種情形之下，締結集體協議的運動纔成爲工人羣衆的創造力的顯著的高昇的有效的辦法。

集體協議應當成爲企業裏一切勞動組合的工作的基礎。勞動組合組織的成績將以它們事實上如何組織工人，技術工人與職員去完成並超過國家的計劃，它們事實上如何表現對於工人的物質生活與文化需要的關心來作考核的。

集體協議的締結，這是對於我們的勞動組合的組織的嚴格的考驗。勞動組合的中央的、州的、工廠工場的和地方的委員會應當以布爾什維克的精神來進行這個最重大的政治經濟的運動。

勞動組合的光榮事業是——把這個重大的政治經濟的措施轉化爲還要更大地鞏固我們祖國的力量和改善勞動者的幸福程度的新的手段。

無疑地，勞動組合的組織，爲了完成共產主義學校的自己崇高的角色起見，會做好這一切的。

論蘇聯的勞動生產力問題

吳清友

蘇聯全國工業化，農業集體化以及人民物質，文化生活之改善，與整個國民經濟勞動生產力之提高，有着密切的關係。俄羅斯由落後的國家在短促的歷史期間內，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工業——農業國之一，其中也應歸功於勞動生產力之有加無已的增進。蘇聯人民所表現出的勞動英雄主義，成爲了實現五年計劃的重要基礎。以提高勞動生產力爲主要目標的共產主義禮拜六，社會主義競賽和斯塔哈諾夫運動，突擊運動成爲了社會主義建設的羣衆運動，使蘇聯日趨富強與繁榮。至於在經濟關係上趕上並超過資本主義國家，更有賴於勞動生產力之提高。因爲勞動戰線上的創造作用和雄偉熱誠，是能產生奇蹟的。蘇聯認爲：『勞動生產力——這歸根結蒂是保證新社會制度勝利的最重要的，最主要的東西。資本主義創造了在農奴制度下未曾有過的勞動生產力。社會主義所以能夠最終戰勝，而且一定會最終戰勝資本主義，就是因爲社會主義造成新的，更高得到的勞動生產力』。『其實，社會主義是只有在高度的勞動生產力基礎上，只有在那些資本主義制度更高的高度勞動生產力基礎上，只有在生產品和各種消費品十分豐富的基

礎上，只有在社會全體成員都過着豐裕文化生活的基礎上，才能勝利的。可是，爲要使社會主義能夠達到自己這個目的，並把蘇維埃社會變成最豐裕的社會，就必須使我國有超過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勞動生產力的勞動生產力。如果不然，那就根本用不着想有十分豐富的生產品和各種消費品。『勞動生產力問題，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所佔的地位如何重要，從這些言辭中，很明白地可以看得出來。』

在蘇聯，勞動生產力不斷的增長，是工業，農業和運輸飛快發展的決定條件，是進步的有力因素，是新社會無敵力量的指標。

在對德戰爭的前夜，蘇聯工業中勞動生產力的水準，已躍居歐洲的第一位和世界的第二位。勞動生產力之增進，首先是勞動熱誠的昂揚，技術的進步和生產機構改進的結果。如果蘇聯到今天還是如帝俄時代那樣配備着比英國壞四倍，比德國壞五倍，比美國壞十倍的生產工具，則勞動生產力的任何提高，都是夢想。

蘇聯勞動生產力增長的基本原因，還是在於它的社會制度之優越。這在十月革命後，恢復時期結束前（一九二二——一九二五）勞動生產力就已超過革命前的水準這一點上，就獲得了證明。在五年計劃時期內，蘇聯的勞動生產力，更加邁步前進了。在第一屆五年計劃歲月裏，蘇聯勞動生產力計提高百分之四十一，在第二屆五年計劃歲月裏，蘇聯勞動生產力計提高百分之八十二。由於法西斯德國之背信襲擊蘇聯，以致未竟全功的第三屆五年計劃，原來預定在工業方面的勞動生產力提高百分之六十五，在建設

方面——百分之七十五，在鐵道運輸方面——百分之三十二。

在蘇聯，勞動生產力提高所包含的具體意義，可以從下舉數字中顯示出來；在第一屆五年計劃時，勞動生產力每提高百分之一，就等於得到價值三億一千萬盧布的補充產品；在第二屆五年計劃時，勞動生產力每提高百分之一，就等於得到價值五億盧布的補充產品；在第三屆五年計劃時，勞動生產力再提高百分之一，就等於得到價值九億五千萬盧布的補充產品。

以勞動生產力增長的速度來說，蘇聯超過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從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十年內，蘇聯勞動生產力計提高百分之一百四十九點九，同一時期，在英國只提高百分之十一點三，在德國只提高百分之十一點七。如果以工業的個別部門來說，則在這一領域內的進步，尤為可觀。例如一九三七年在蘇聯石炭工業中，每一工人的出品，計達三百二十七噸；而在英國則只有三百一十一噸，在法國——一百九十五噸。一九三七年在蘇聯的生鐵溶鑄中，每一工人的出品達七百五十六噸，同年在德國則為六百十二噸，在英國——五百三十噸。這是平均數。假使拿蘇聯最先進的工業企業來說，那要突出得更多。例如烏格尼托高爾斯克的『斯大林』製造廠，一九三七年每一工人的出品，達二千一百四十噸。這比一九二九年美國同一部門的工人產品之平均數，超出四百噸。但大家都知道，一九二九年曾是美國工業中勞動生產力最高漲的年份。然而就蘇聯整個國民經濟的勞動生產力來說，依然比美國為落後。趕上並超過美國單一工人勞動生產力

之水準，仍是蘇聯所企求的。

至於說到蘇聯提高勞動生產力的方法，是與別的國家不同的。在資本主義國家中，一般說來，主要是用加強對工人剝削的方法，來達到勞動生產力的提高。那裏有大批的勞動後備軍，使資本家有可能來選擇最壯健的工人，而把那些在工作中已經不能提供較高效率的勞動者，拋棄街頭。同時應當明瞭，提高勞動生產力，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帶着周期的性質。在景氣時期，勞動生產力提高起來，而在恐慌時期，則勞動生產力降低下去。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提高勞動生產力的法則，沒有絕對的意義。」這在下舉的數字中，可以獲得證明：

在十九世紀全期中，資本主義世界整個工業的勞動生產力，約增百分之一百，平均起來，每年增加百分之一。在最好的年份，它的增加也沒有超過百分之四——六。就在二十世紀，情況也沒有向更好的方面變化。根據國際聯盟的統計資料。從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七年這一時期，資本主義各國的每一工人的平均出品，總共提高百分之四，而在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恐慌時期，它比一九二九年，計跌落百分之十一，只到一九三六年，對比一九二九年才提高百分之五。

一九三七年，資本主義各國的勞動生產力升降互見。一九三七年，美國的勞動生產力比一九二九年降低百分之三，法國——百分之八，義大利——百分之五，波蘭百分之三。同一時期，只有德國和日本勞動生產力略為提高。計德國提高百分之十左右，日本

提高百分之三十三。原因是由於這個時期，德國和日本已成爲公開的法西斯侵略國，積極備戰，以反對亞洲和歐洲愛好自由的民族。

在勞動生產力領域內，蘇聯顯出的特徵，是逐年上升。因爲在蘇聯，是實行生產手段社會主義所有制。蘇聯的人民，不是爲剝削者，爲利潤，爲市場而工作，而是爲自己的社會，爲自己本身而工作。就是因爲此種自覺，產生了人民的勞動熱誠，產生了對勞動的新態度，看勞動是對自己有切身利害關係的事業，大家都企求工作做得更好些，更有效率些。從這裏我們就可以找到爲甚麼蘇聯的勞動生產力總是逐年上升而不會下降的重要解釋。在蘇聯，勞動生產力不斷的增長，已帶有經常有效的規律性。

不言而喻的，蘇維埃政權從帝俄手裏接收過來的遺產，是經濟——技術非常落後，而在財政關係上說，甚至是外國資本的半殖民地。這樣的國家，在短短的三十年中，居然能夠把全國工業化，農業集體化，人民生活獲得充分保證，而不虞匱乏，這絕不是偶然的。蘇聯能夠戰勝法西斯強國，也可以從勞動生產力這一問題上找到解答。

當對德戰爭的時候，蘇聯西部及南部的許多重要企業大規模地往東部各區撤退，許多年富力強的熟練勞動者紛紛上陣殺敵，而後方的勤勞人民，尤其是婦孺，都能接替崗位，在新地區恢復生產，提供更多的產品，這種社會制度的效率和組織能力，以及人民奮不顧身地貢獻一切力量於國家的英雄氣概，是不難想像的。因此，就在戰爭的時期，蘇聯的勞動生產力還是往前進展。而並沒有中斷。只從一九四二年四月至一九四四年

月這一時期，蘇聯整個工業的勞動生產力平均增加百分之四十。在軍用工業中，勞動生產力提高得還要多些。在一九四二年——一九四四年這兩年中，航空工業的勞動生產力，提高百分之四十七，坦克製造業——百分之四十三，軍需品製造業——百分之五十四。軍用工業的個別部門所提供的出品，比較前水準增加十倍以上。超過工作定額百分之二百的工人人數，在航空工業中，佔百分之二十三，在地雷製造業中——百分之二十一。點五，在坦克製造業中——百分之二十五，在電力工業中——百分之二十三點三。烏拉爾的製造廠，在一九四三年的十一個月內，把自己的出品增加百分之六十，同時工人的數量却減少百分之四。一九四〇年這一製造廠的每一工人之製品，以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的價格計算，每月平均為一千四百零八個盧布，而在一九四四年，以同一價格標準計算，則達七千三百二十九個盧布。無疑的，工人——工程師以及一般技術工作人員的創造才能及勞動熱忱，在勞動生產力的提高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他們經常地善於改進生產技術過程和勞動組織。激勵地提高勞動生產力的流動工作方法，在戰爭時日裏，獲得廣泛的流行。此種方法，使有可能在少量設備和工人的條件下，增加軍用品的生產——而在水平的條件下，則增加生產手段和一般消費資料的生產。這個方法的特徵，是在於它能夠促進生產方法的改進，最好地利用設備品和勞動力。以前車床、切床、鉋床分別設置，零件移動需時，結果使生產的過程延緩了。在採用流動工作條件下。情形完全不同了，設備與生產的技術過程有嚴格的配合，而零件亦無需搬動；因此，節省了

不少時間和勞力。製成的零件在傳遞帶上，在車床之間自動傳遞，結果零件的生產過程加快了，勞動生產提高了，所用的車床數量及補充的工人也減少了。以「赤色無產者」製造廠為例，它從採用流動工作方法之後，每月的出品增加百分之六十二，而所用的設備品則減少百分之二十八。從這裏可以瞭解，勞動生產力之提高，是與生產的合理化密切相關聯的。

蘇聯爲着及時完成復興及發展國民經濟的新五年計劃對於提高勞動生產率，加以特別重視。「新五年計劃法規」指出：「在完全利用八小時工作日，需要勞動較多的工業部門全面機械化——國民經濟進一步電氣化以及生產過程強度化的基礎上，提高勞動生產力」。

根據新五年計劃法規的規定，到一九五〇年，蘇聯工業中的勞動生產力比戰前水準將提高百分之三十六，在建設中將提高百分之四十。

誠然，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水平，是依繫於許多原因。「資本論」第一卷就提供了完整的解釋：

「勞動的生產力，是由許多複雜的情況來決定的，其中，如：工人技巧的平均程度，科學發達及其應用的水準，生產過程的社會組織，生產手段的規模及其效能，最後是自然條件。」

我們可以說，上述勞動生產力的高度水準，歸根結蒂所依繫的這些因素，在蘇聯是

全部具備的。但應當指出，天然富源，只是提高勞動生產力的物質前提。要利用天然富源以推動生產力往前發展，首先須有合理的社會制度。大家知道天然富源是在幾萬萬年以前就已形成了的，然而蘇聯比帝俄生產力却有無比的，高度的發展，這就可以瞭解社會制度在提高勞動生產力中所起的作用。在經濟關係上說，事實證明蘇聯的社會制度的確免於恐慌，失業與貧困。整個國民經濟建設受統一的，有計劃的指揮，一切生產手段都集中在國家手裏，保證它能夠普遍的應用最新的技術，動員全部的人力和物力，以空前的速度來發展生產力，來提高勞動生產力，這是蘇聯經濟體制優點之所在。

「勞動生產力之高漲，首先要求大工業：燃料、鐵、器械製造，化學工業的物質基礎之保證。」

無疑的，蘇聯全國工業化計劃之順利的完成，蘇聯創立了社會主義的物質——技術基礎。蘇聯重工業所已達到的水準和規模，使它有可能用頭等的技術來裝備國民經濟的各部門，並使需要勞動較多的各過程全部機械化，從而也促進了勞動生產力經常地提高起來。按照生產的技術，以及工業中新技術的充沛程度來說，蘇聯執着世界的牛耳。戰時蘇聯對國民經濟技術改造的過程，並未中輟，而且有進一步的發展。在戰爭的歲月裏，蘇聯的生產技術更加改進了，需要勞動較多的過程之機械化增長了，生產的自動化以及先進的生產技術方法之廣泛的採用，這一切戰後都使蘇聯新五年計劃中，社會主義的工業企業可獲得更多，更新式的器械和車床之可能，從而也替勞動生產力迅速的增

長，造成了新的，有利的物質前提。到一九五〇年，蘇聯工業中，將有一百三十萬具切床。這超過一九四〇年資本主義最發達的美國之車床總數百分之三十。到一九五〇年底，蘇聯鐵道運輸的機械化，將達到百分之七十五，木料之採集及轉運之機械化，也將達到同樣的水準。每一工人的電力配備，將均加一倍半。

提高勞動生產力的物質前提，雖然要倚靠經濟——技術的發展；但人，始終是最寶貴的決定因素。在生產過程中，有勞動能力的，熟練的，善於駕駛技術的，精通技術性能的人，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在蘇聯，由於社會制度之優越，人民生活之有保證，沒有恐慌和失業，生產手段之公有化，農——商業之集體——合作化——均足以鼓勵人民作忘我的勞動，這在蘇聯盛行的社會主義競賽及斯塔哈諾夫運動中最明顯地表現出來。

按照蘇聯新五年計劃，在五年中，蘇聯將訓練四百五十萬名年青的，熟練的勞動後備軍，而透過個人，工作隊，班級以及斯塔哈諾夫學校訓練出來的新工人，將達七十七十萬人，此外還有一千三百九十萬人，將提高其熟練程度。顯然的，這對蘇聯今後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將給予極為有利的影響。

如所周知，每一社會制度都有它自己的組織勞動的方法，組織勞動紀律的體制。農奴主制度，借助鞭笞，資本主義制度借助生產手段之剝奪，逼迫工人從事工銀的勞動。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社會勞動的組織，是靠勞動者自由的，自覺的紀律來維持。如社會

主義競賽以及斯塔哈諾夫運動，就是顯明的實例。這兩種方法，在蘇聯是提高勞動生產力的有力因素。在千百萬勞動者最高限度的積極性和勞動熱誠基礎上，改變了蘇聯全國的經濟和文化的面貌，蘇聯的勞動競賽制度，根本上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的營業競爭制度。因為競爭，不管是自由的，或獨占的，都以獲得超額利潤，奪取銷售市場，佔有原料來源地為目的。這裏統治着『大魚吃小魚』的法則。所謂『企業精神』和『發起自由』對千百萬勞動者都是絕緣的。

社會主義競賽，是勞動者同志合作和相互幫助的體現。在這裏，勞動者真的能夠自由地發揮他自己的才能，貢獻他自己的力量，它不是強凌弱的競爭，而乃是朝向共同目標而齊心協力的運動。在這裏個人的利益與社會的利益是符合的。這裏先進的工人是幫助落後的工人的。如果說競爭是『打倒弱者』，那末競賽是『向好的看齊』！

蘇聯就是仗着此種組織社會勞動的新方法和新體制——社會主義競賽，使第一次五年計劃能夠在四年中完成，而在第二次五年計劃歲月裏則出現了社會主義競賽的新形式——斯塔哈諾夫運動。它是社會主義競賽更高的階段，是大眾的，全民的運動。它的產生，首先是蘇聯勞動者物質，文化水準之改善和提高的結果，是廣泛地應用最新技術的結果，是大批善於駕馭新技術的幹部出現的結果。它是合乎科學原則的勞動方法之體現。蘇聯第二次以及第三次五年計劃，仗着斯塔哈諾夫運動，使勞動生產力空前地高漲起來，完成了偉大的建設工作。在衛國戰爭時期，斯塔哈諾夫運動在蘇聯獲得了特別廣

泛的發展。例如在航空工業中，參加社會主義競賽的工人和職員，達百分之八十五，在軍備工業中——百分之八十六，在軍用品工業中——百分之八十六，在石油工業中——百分之八十。在航空工業中，斯塔哈諾夫運動者佔全體工人百分之三十九，在軍備工業中——百分之三十八，在石油工業中——百分之四十二，在靴鞋工業中——百分之四十四。

自戰後新五年計劃公佈以來，蘇聯全國又掀起了社會主義競賽的巨大浪潮。每日均有新企業和新工人參加斯塔哈諾夫運動。因此，一九四六年為首的十個月與一九四五年同一時期相比較，蘇聯生鐵的熔鑄，計增百分之十一，鋼——百分之十三，鋼條——百分之十四，頓巴斯煤炭的開採——百分之三十三。

除了社會主義競賽及斯塔哈諾夫運動之外，蘇聯還採用工人全體大會，生產會議，生產——技術工作人員會議，工作隊，斯塔哈諾夫學校，技術學校以及各種宣傳、講演、揭貼、報章雜誌、以及物質的鼓勵和榮譽的獎賞如獎狀，勳章等等。來喚起勞動生產力之提高。「新五年計劃法規」中說到：「在社會主義競賽的基礎上，保證儘量又收工、農及知識分子向實現五年計劃的事業上去，不僅要完成，而且要超過完成國民經濟復興和發展的五年計劃」。蘇聯政府號召全力幫助生產的革新者，幫助他們最善地利用進入蘇聯企業的新技術，給科學家，發明家，生產組織者，工程師，技術人員以最大的鼓勵。在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這一年內，蘇聯軍備工業的工人和職員，就作了十三

蘇聯在這方面落後的原因，是「因為不久以前，蘇聯在工業關係上，以及以全國人口總數來說，蘇聯都是可怕的落後國家，在短時期中，它來不及完全追回業已消逝的韶光」。雖然如此，但蘇聯在社會主義所有制下，生產力，生產品以及勞動生產力提高的結果，都是點滴歸公，這是與以角逐利潤為私有的其他國家是不同的，而且按照目前生產力發展的速度往前發展，蘇聯在經濟關係上趕上並超過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只是時間的問題，一九五〇年蘇聯所有的車床總數，比一九四〇年美國所有的車床總數，將超過百分之三十，這是值得注意的。

蘇聯建國沒有指望外來的援助，它也不要殖民地，它是千真萬確地奉行「自力更生」的原則的。在這個原則之下，蘇聯的勞動者為社會主義的積累，必須克勤克儉，即是須把自己勞動的一部份剩餘生產品，貢獻給國家，作為社會主義建設之用。但社會主義的積累與人民物質生活的改善，是並行不悖的。社會主義的積累愈增加，則人民的物質生活愈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愈提高，則社會主義的積累愈增加。因為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這兩個目標可由蘇聯政府加以合理的調節，何況那裏個人的利益與社會的利益並無衝突之可言，在蘇聯，普遍地設立免費的學校、圖書館、閱覽室、俱樂部、體育場、公共食堂、義務診療所、托兒所、兒童園、休養所、療養院……這一切在別的國家，勞動者都要付出很高的代價的。例如在許多資本主義國家裏，租房往往佔着工人工資總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四十，而在蘇聯是沒有這種情形。在蘇聯，這一切大半不化

錢，而在別的國家却所費不貲。所以單在工資上，看不出蘇聯勞動者實際的收入。蘇聯勞動者把一部份剩餘生產品供獻給國家，也不會影響到他們的生活。同時蘇聯生產不斷的增長，使它有改善勞動者物質——文化狀況的可能。斯大林曾經這樣說過：『吾國革命之特徵，在於它不僅給了人民自由，而且也給它物質福利，也給它富裕的和文化的生活之可能』。

一九二八年，蘇聯全國的工人和職員只有一千一百六十萬人，一九三二年增至二千二百九十萬人，一九三七年增至二千七百萬人，一九四〇年增至三千零四十萬人。到新五年計劃結束的一九五〇年，蘇聯的工人和職員將增至三千三百五十萬人。以工資來說，一九二四——二五年蘇聯全國工資基金共有三十八億盧布，一九二九年增至九十七億盧布，一九三三年增至三百四十九億盧布，一九三七年增至八百二十二億盧布，一九四〇年增至一千六百二十億盧布，到一九五〇年蘇聯全國工人和職員的工資將增至二千五百二十三億盧布。工資基金的增加，主要是倚靠勞動生產力的增長，以及在業工人和職員數目的加多。在蘇聯勞動生產力的提高，與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也是息息相關的。『首先是工人物質狀況根本的改善，成爲了斯塔哈諾夫運動的基礎』。如果在蘇聯有恐慌，有失業，人民生活得不好，不愉快，任何斯塔哈諾夫運動是不會有的。因此，關心人民的生活，在蘇聯政府是經常最注意的項目之一。要改善人民生活，就必須多生產食品以及其他消費資料。根據新五年計劃，到一九五〇年，蘇聯的農產品比一

九四〇年將增加百分之二十七，捕魚增加一倍半，糖增至一億四千四百萬磅。與一九四五年相比，豬增加三倍，羊及山羊——百分之七十五，牛——百分之三十九。

新五年計劃時期內，住宅基地的費用，較諸第三次五年計劃時，是四百二十三億盧布與一百五十五億盧布之比。各種社會文化措施的費用，到一九五〇年將達到一千零六十億盧布、比一九四〇年增加二倍又六。到一九五〇年，蘇聯大學生的入數，將達到六十七萬四千人，每年畢業的專家，將達到六十萬零二千人。技術學校的學生，將增至一百二十八萬人，每年畢業的中等熟練的專家，達一百三十二萬六千人。初級及中級學校的學校人數，將達三千一百八十萬人。這表明蘇聯熟練的技術專家幹部逐年增加起來，這是勞動生產力增長的有力保證。此外，蘇聯國家勞動後備部還廣事於青年熟練程度的陶冶。

蘇聯對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關心，也在社會保險支出的增加上表現出來。一九三八年，此種支出為六十三億盧布，一九四〇年——八十六億盧布，一九四五年——一百零一億盧布。在新五年計劃時期內，預定為六百一十六億盧布，每年平均一百二十億盧布多。

壯年工人，對勞動生產力，也具有極大的意義。這一點在蘇聯佔着優越地位。蘇聯年青的工人，在工業中所佔的比重，是相當大。例如在中型的機器製造業中，工人年齡在二十五歲以下者，計佔百分之五十五，在鐵道運輸上——百分之三十二，在工業合作

社中——百分之六十。

在蘇聯「各盡所能，按勞取值」的社會中，工資以按件報酬為主，因為這樣可以準確地確定個別勞動的質與量，這樣可以使勞動者特別關心他自己勞動生產力之提高，因之也改善了他的物質狀況。除了按件計酬之外，還有計時報酬的工資，此種形式的工資，大半是流行於若干種特殊的勞動，那裏關於勞動的質與量，是頗難計算出來的。還要指出一點，就是按件報酬工資，也有遞增的規定。如果每一工人完成了工作的定額：那末他就得到通常的工資，如果他的製品超出定額，則超出部份的報酬，要比基本單位所得的報酬多得多，這在蘇聯稱為按件——累進報酬制，對於個別勞動者，特別是不大熟練的勞動者的勞動生產力之提高，起着巨大的作用。蘇聯認為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勞動者的物質利益必須特別地關切，不然就無法提高勞動生產力，繁殖國富，把社會順利地往「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階段推進。

論合作社

列寧

一

我認爲，我們對於合作社運動的注意，還是不夠的。並不是人人都理解：現在即自十月革命以來，而且與新經濟政策無關（相反的關於這，我們必須指出，正是由於新經濟政策），我們的合作社曾獲得了特殊重要的意義。在舊的合作社運動者的夢中，有許多東西是空想的。有時他們簡直空想得可笑。但是請問他們的空想是在什麼地方？就在於他們不懂得工人階級爲推翻剝削者的統治而進行的政治鬥爭的基本意義。此種推翻的事業，現在我們已經完成了。而在舊的合作社運動者的夢中，那許多空想的、甚至浪漫、而且甚至是庸俗的東西，現都變成了最質樸無飾的實現了。

事實上，我們的國家政權既然是掌握在工人階級底手中，生活手段既然屬於這個國家政權所有，那末真正留待我們來完成的唯一任務，就只有人民底合作社化了。在人口最大限度的合作社化的條件之下，在先前爲公正地相信階級鬥爭必要、相信奪取政權鬥

爭必要的這般人所正當地嘲笑、輕蔑、鄙視的社會主義，就自然而然地達到了它底目的了。然而並不是所有的同志，都已經體會和認識到俄羅斯底合作社在目前獲得了如何巨大的、無限的意義。在新經濟政策中，我們向作爲商人的農民做一種讓步，向私人貿易原則做了一種讓步。正是由於這種理由，合作社才獲得了這樣重大的意義（這和某些人所想的，是恰恰相反的）。老實說，在新經濟政策下面，十分廣泛而深入的將俄國人口組織在合作社裏面，正是我們所需要的事情，因爲我們現在已經確定了將私人利益，私人貿易利益，將國家對於私人貿易利益的檢查與統制配合起來的程度，使私人貿易利益服從於公共利益的程度——這個問題，在先前對於很多社會主義者乃是一個難以逾越的障礙物。在事實上，國家對於一切大規模生產手段底掌有，國家政權的掌握在無產階級手中，這個無產階級底與千百萬小農之聯盟，這個無產階級對於農民領導權之保證等等，這難道不是經合作社——而且單單經合作社（在以前，我們是把它當作小買賣看待的，而且從某種方面看起來，我們現在在新經濟政策下面是有權利把它這樣看待的），而來建立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要的一切嗎？這雖然還不是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完成，但是這是爲完成這一建設所必要而充足的條件。

我們很多實際工作的人員，正是對於這種情形估價過低了。在我們中間是有人輕視合作社的，他們不理解：第一，從原則方面（生產手段是歸國家所有的），以及第二，從採用對農民盡可能是最簡單、最容易、和最易解的方法和手段以過渡到新秩序的方面

看來，這一合作社有着如何重大的意義。

但是這又是最重要的事情。幻想藉各式各種工人的團體來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回事，而在實踐上學習這樣建成社會主義，即使每個小農都可以參加這種建設工作，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們在目前所已經達到的，就是這種階段。然而毫無疑問的，我們雖已達到這個階段，可是我們利用它的却太少了。

在運用新經濟政策上，我們有點矯枉過正了，這並不在於我們太過於重視自由產業及自由貿易的原則；在運用新經濟政策上我們的矯枉過正是在於我們曾經忘記了想到合作社，是在於我們現在對合作社估價過低，是在於我們已經開始忘掉了合作社在上述兩方面的巨大意義。

我現在想與讀者討論一下，根據此種「合作社」原則，現在在實際上能夠做而且應該做的究竟是那些事情。現在用什麼手段，我們能夠而且應當開始發展這種「合作社」原則，以便一切的人都可以明白它的社會主義的意義。

在政治上，我們要將合作社安置在這樣一種地位上，就是一般說來，合作社不僅永久享有某種特權；而且這些特權必須是純粹的財產的特權（銀行利率等等）。我們必須以這樣的國家款項貸予合作社，這種款項既是數額不大，但亦須超過我們所貸與私人企業的數目，超過那些既是從事經營重工業者的數目，等等。

每種社會制度，都只是在一個一定的階級之財政上的援助之下而興起的。那「自由

的「資本主義底產生所費的千百萬萬盧布這裏就無需乎說到了。現在，我們必須要意識和見諸實行的，就是：我們現在必須特別加以協助的社會制度，就是合作社制度。但是在援助這個字的真正意義上去支持合作社，換一句話說：將這一援助理解為對於任何合作社商業的援助，是不夠的；將這一援助理解為對於這種合作社商業的援助，就是在這種合作社裏面確有真正的人民大眾之參加。對於參加合作社商業的農民給予一種獎勵，這是一種絕對正確的方式：但是全部問題底要點，却在於檢查此種參加，檢查這一參加的覺悟程度，和這種參加的良好品質。嚴格地說起來，當一個合作社社員跑到一個鄉村裏面去開辦起合作社商店的時候，老百姓是絕不會參加的；但是在同時，他們爲了自身的利益計，却急於試一下。

問題還有另一方面。從「文明的」（首先，是識字的，有教育的）歐洲人的觀點看來，爲了使人人都能參加合作社事業，而且都能積極地、而不是被動的消極的參加，我們還需要作的是很少很少了。老實地說，我們需要作的，「只」有一件事情了，這就是說：要使我們的人民變成如此「文明的」人民，以致於他們都能夠理解人人參加合作社事業的利益，並且都能夠調整此組參加。「只是」這一點而已。現在爲了轉到社會主義，我們不需要其他任何賢明辦法了。但是爲了要達到這「只是」一點起見，却需要來一個完全的變革，却需要一個全體人民大眾的文化發展之整個時代。因此，我們的規則應該是：要儘可能減少哲理的空談和聰明手腕的使用。在這一關係上說起來，新經濟政

策乃是一種進步，因為新經濟政策適應於最普遍的農民的水平，因為新經濟政策並不求任何高於最普通的農民之上的東西。但是，為了使全體人民人人都能經過新經濟政策來參加合作社事業，那就需要一個整個的歷史時代。我們在一、二十年之內，就可以很好的渡過這一時代，沒有一般的普遍的識字教育，沒有充足程度的工作效能，沒有充分的訓練全國人民使其獲得讀書的習慣，而且沒有為作到進一步的物質基礎，沒有對於——例如說——歉收、飢餓，等等的相當的預防，那末我們將不能達到我們的目的。現在全部的問題就在於善於將我們已經充分表現出來並且獲得完全成功的這種革命的行動範圍，——這種革命的熱忱，——能夠將這些和（這是我幾乎隨時可以說出的）作一個力能勝任的受過教育的商人的技能，——這是以使人們成爲一個好的合作社經營者——結合起來。所謂作商人的技能，我是指作一個有教養的文明的商人而言的。讓那一般以爲他們從事經商，即會作商人的俄國人，或者簡單地只是農民，好好地想一下這一點吧。事實上，事情完全不是這樣的。他雖然在做生意，但是這距作一個文明商人的技能還遠得很。現在，他是以亞細亞的方式從事經商的；爲了善於作商人起見，則須要以歐洲的方式來從事經商。然而這中間隔着一個整個的時代。

要之：對於合作社必須予以經濟上的、財政上的、以及銀行的種種特種——這乃是我們社會主義的國家對於組織全國人口的新原則所必須給予的援助。但是這還是一般地描畫出了這個任務的輪廓，因為任務的全部內容，在實際上還依然是沒有詳細規定，沒

有詳細描述過的，——這就是說，我們要善於尋求出我們爲了組織合作社而要給予的那種「獎勵」形式（以及給予它此種獎勵的條件），要善於尋求出我們可以充分幫助合作社的那種獎勵形式，要善於尋求出我們藉此可以得到有文化素養的合作社經營者的那種獎勵形式。而在生產手段社會共有制度之下，在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的階級勝利之下，文明的合作社員制度，那就是社會主義制度。

21

每當我寫到新經濟政策的時候，我總引證我在一九一八年寫的關於國家資本主義那篇文章。這曾經不止一次地引起了幾個青年同志底懷疑。但是他們的懷疑，主要地是關於抽象的政治問題的。

在他們看起來，生產手段屬於工人階級所有，而國家政權則歸這個工人階級所掌握的制度是不能叫國家資本主義的。可是他們却不曾注意到：我使用「國家資本主義」這個名詞，第一、是爲了將我們目前的地位與我在和所謂左派共產主義者爭論中所保持的地位作一歷史的聯繫；而且就在當時，我就已經主張，國家資本主義是高出於現代經濟制度的；對我重要的是在普通的國家資本主義限我在導引讀者研究新經濟政策時所說的那種不平常的，甚至是不很平常的國家資本主義之間建立一種連續的聯繫。第二、我總

是經常着重於實踐的目的。而我們新經濟政策之實踐目的，就在於租讓權之獲得，毫無疑義的，在我們之條件下面，租讓權乃是一種純粹型的國家資本主義。這就是我設想的國家資本主義的議論。

但是事情還有另一方面，在這一方面，我們還可能需要國家資本主義，或至少是需要某種國家資本主義相並行的東西。這就是合作社的問題。

毫無疑義的，在資本主義國家底環境之下，合作社乃是集體資本主義的機關。而同樣沒有疑義的，在我們目前的經濟活動的環境下面，當我們將私人資本主義企業——雖然這是私人的企業，然而它却是位置在公共土地之上，而且是在屬於工人階級所有的國家政權底統制之下——跟澈底社會主義型的企業（屬於國家所有的生產手段，企業位置於其上的土地，以及一切整個的企業）結合起來的時候，那末，這裏還發生了關於第三種企業的問題；這種第三種企業，在以前，從原則的觀點看來，並不是獨立的，這就是合作社的企業。在私有的資本主義下面，合作社企業與資本主義企業之區別猶如集產企業與私人企業之區別一樣。在國家資本主義下面，合作社企業與國家資本主義企業亦有不同，這第一，因為它們乃是私人的企業；第二、因為它們乃是集體的企業。在我們的現在制度之下，合作社企業與私人資本主義企業是不同，這因為它們乃是集體企業的緣故；但是，如果它們是位置在上面的土地以及生產手段，都屬於國家所有，都屬於工人階級所有的話，那末它們和社會主義的企業是沒有什麼不同的。

當討論到合作社問題的時候，我們對於這種情況正沒有充分的考慮到，人民忘記了：由於我們國家制度底特徵之故，我們合作社遂獲得了一種全然不同的非常的意義。如果將我們的未曾獲得任何可觀的巨大發展的租讓事業丟開不談，那末在我們的條件之下，合作社往往是和社會主義完全一致的。

對於這個意思，我需要加以解釋。自歐文（ROBEY OWEN）起，舊的合作社運動者，其計劃的空想性，是在什麼地方呢？就在於他們夢想要用社會主義來和平的刷新現代社會，而沒有考慮到像階級鬥爭、工人階級奪取政治權力、推翻剝削階級底統治這一種基本問題。所以，我們將此種「合作社」社會主義，視為一種完全空想的東西，將那想用簡單的人民合作社化的辭法把階級敵人轉化為階級合作社，把階級鬥爭轉化為階級和平（即所謂國內和平）的夢想——看作浪漫的，甚至庸俗的東西，我們是對的，毫無疑義的。從現代底基本任務的觀點看來，我們是對的，是正確的，因為如果沒有奪取國家政權的階級鬥爭，那社會主義是不能夠建立起來的。

但是看一看吧！在國家政權掌握在工人階級手中之後，在剝削者底政治權力被推翻之後，在一切生產手段（工人國家自願地、有條件地，以租讓的形式暫時讓給剝削者的那些生產手段除外）都歸工人階級所有之後，事情便如何的發生變化了。

現在我們可以說，對於我們，合作制的單純的增長（除上述的「小小的」例外之外），與社會主義的增長乃是同一回事，而同時我們則不得不承認我們對於社會主義觀

點底根本的改變。這一根本的改變，就在於：從前我們是將重心放在、而且不得不放在政治鬥爭上，放在革命上，放在奪取政權上等等；而現在，我們却不得不將重心移到和平的，有組織的，「文化」的工作上面來了。如果不是爲了我們的國際關係，如果不是爲了國際關係，不是爲了爭取我們世界範圍內的地位的義務，那末我簡直就可以說：我們的重心已經轉移到文化工作上面來了。如果我們將這一點撇開不談，只是國內的經濟關係爲限的話，那末我們現在確確實實是把工作重心轉移到文化工作上面來了。

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有兩個主要的構成時代的任務：第一個任務，就是改造我們的機關，這種機關是完全不適用的，是我們目前一個時代，完整地接受過來的；在鬥爭的五年當中，我們不會，而且不能對它加以任何認真的重大的改變。第二個任務，就在對農民底文化工作。這種在農民中間的文化工作，正如經濟上的目的的一樣，正是合作化。如果在農民完全合作化底條件之下，那我們便能夠堅實地以兩足矗立在社會主義底地基之上了。然這種農民完全合作化的條件，就包含有農民（而且正是由於在作爲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的文化水平在內，因爲如果沒有整個的文化革命，那末這種完全的合作化也就成爲不可能的事情了。

我們的反對者曾經不止一次地告訴我們說：我們是在從事於一種輕率而鹵莽的事業，就是，要將社會主義移植在文化發展不足的國度裏面。但是他們却錯誤了，因爲我們並不是從根據理論（各式各種迂腐的理論）所假定的那種終點着手的，而且我們的政

治的與社會的變革曾給了文化變革。文化的革命底前驅，這種文化的革命，現在正擺在我們的面前。

現在這種文化革命實足以把我們轉變爲一個完全地社會主義的國度，但是這一文化革命，對於我們却是純粹文化性質（因爲我們是目不識丁，無學無識的緣故，）以及物質的性質（因爲要作一個有修養的人，則須要有物質生產手段之相當發展，則須要有相當的物質基礎）底莫大困難。

蘇聯的四個五年計劃

羅采輯

蘇聯在沒有實施五年計劃以前，是一個技術落後的和半赤貧的破產的國家。『這個國度既為四年帝國主義戰爭所破壞，又為三年國內戰爭所破壞，它有半識字的居民，有低度的技術，有個別的工業孤島，這些工業孤島曾沉沒在極小的農村經濟所形成的大海中間，——我們從過去得到的遺產，就是這樣的一個國度。』（斯大林）這樣一個『技術落後的和半赤貧的破產的國度』，一二十年來，竟一躍而為世界上最進步和最有力量的國度。這一飛躍的成功，是由於蘇聯人民勝利的完成和正在繼續完成四個五年計劃的結果。

第一個五年計劃

蘇聯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就是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二年五年間所實行的發展國民經濟建設的計劃。由於這個計劃的完成，建立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

這個計劃的基本任務是什麼呢？斯大林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總結」中說：「是在於把蘇聯由農業的和不强有力的、由資本主義任意支配的國度，變為工業的、强有力的、完全獨立的、不由世界資本主義任意支配的國度」；在工業上，把蘇聯變成為工業的國家；在農業上「把小的和分散的農村經濟轉移到大的集體經濟的軌道上去」；並在蘇聯國內「造成一切必要的技術和經濟上的前提，來盡量提高國家的防禦能力」。由於這個計劃的施行，「就必需消滅蘇聯在技術上與經濟上的落後，……使得蘇聯在技術上與經濟上不僅能夠趕上而且及時的超過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度」，否則蘇維埃政權的基礎就不能穩固。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基本環節，「在於重工業及它的核心——機器製造業。因為只有重工業才能改造和振作整個工業、運輸業和農業。因此應當由重工業開始實現五年計劃。所以恢復重工業，應當作為實現五年計劃的基本。」（斯大林）

這個史無前例的偉大的計劃，在國外資本主義國家的懷疑及嘲笑、國內托派及布哈林派許多叛徒的反對及破壞中，以四年三個月完成了！

下面是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後的輝煌的成績：

在工業方面：使蘇聯從農業國變成為工業國。這從工業出產額和農業出產額在國民經濟生產總額的比重中就可以看出來：一九二八年（第一個五年計劃第一年）工業產額佔百分之四十八，而農業佔百分之五十二；到了一九三二年（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最後一

年)工業產額已升到百分之七十，而農業僅佔百分之三十。這時候工業的出產量比戰前水平增加了兩倍以上。重工業的生產計劃已執行到計劃的百分之一〇八，同時國防工業也有了很大的進展。建立了許多從來沒有過的新的工業部門，如：黑色冶金業的全國化，航空工業、拖拉機工業、汽車工業、車床製造業、現代化學工業……。

而且有幾種工業部門，眞眞做到了「不僅能夠趕上而且及時的超過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度」，到一九三二年時，蘇聯泥炭及農業機器的生產，佔全世界第一位；塊鐵生產佔歐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煤油生產佔歐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電力生產佔世界第三位；煤炭生產從世界第六位升到第四位。

在農業方面：使蘇聯從小農經濟改造成世界上一個最大的農業經濟的國家。原先是用馬和木犁耕的土地，現在是用最新式的拖拉機、耕種機等來耕種了。僅在五年計劃實行的三年之內，就組織了二十萬個以上的集體農場和將近五千個穀物與牲畜的國家農場，而在四年之內，耕地面積擴大到二千一百萬公畝。由於這種農業上的新的集體化和機械化，蘇聯消滅了富農階級，把勞動人民從富農的剝削之下解放出來。

此外，由於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的結果：商業制度也改變了，改變成沒有剝削和投機的商業，用合作社系統、國家商店的系統、集體農場商業的系統代替了舊有的商業制度；工農的物質生活也有了大大的改進，工人失業與農民貧困的現象，早已不再存在；在工人階級和農民中培植出來大批新的，蘇維埃的生產技術知識階級；福利事業及文化

事業也都有了很大的發展。

第二個五年計劃

第二個五年計劃，就是在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七年五年間所實行的發展國民經濟建設的計劃。在這個計劃實行的過程中，首先要完全肅清剝削階級的一切殘餘；同時在這個五年計劃中，要在新的、現代技術基礎上面來改造蘇聯的整個國民經濟；並且要繼續大大地提高工農羣衆的物質與文化生活的水準。在聯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會決議中關於組織問題的決議上這樣寫着：「第二個五年計劃的主要任務，是要最後消滅資本主義分子，克服經濟中和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餘孽，學會儘量利用新技術和新企業、使農業機械化和提高農業出產率——這些任務是極尖銳的提出關於提高所有各部門中的工作質量問題，首先是組織的和領導的質量問題」。

第二個五年計劃也正像第一個五年計劃一樣，是勝利的完成了。

在工業方面：以四年三個月提早完成了。重工業更特別迅速的增長起來，一九三七年時，工業出產量已經四百三十萬萬盧布增加到九百六十萬萬盧布，比原定計劃增加了百分之二二，鐵道運輸計劃，四年即告完成，並超過了原定計劃。建築了許多鐵道、公路，和開闢了好幾條運河，如溝通波羅的海和白海的運河，莫斯科與伏爾加運河等許

多偉大工程。

在農業方面：首先是機械化，在農業中所用的拖拉機和聯合機，約有百分之九十是這個時期中製造出來的。農作物的面積也擴大了，在一九三七年已增加到一萬萬三千五百萬公畝（一九一三年為一萬萬〇五百萬公畝），穀物產量，在一九三七年已增加到六十八萬萬普特（一九一三年為四十八萬萬普特），僅僅集體農場（國家農場不包括在內）在一九三七年供給了國家十七萬萬普特的糧食，比一九一三年地主、富農、和農民所供給的總和，要超過四萬萬普特。並且可以說已經完成了農業集體化。當一九三七年，參加集體農場的，佔整個農民戶數的百分之九十三，而集體農場的面積，則佔全部耕種面積的百分之九十九。

在提高工農羣衆物質和文化生活的水準方面：工人和職員的實際工資增加到兩倍多，集體農民的總收入增加到二·七倍。在一九三六年還頒佈了禁止打胎的法令，設立了很多保產院，托兒所和幼稚園，並用特別法律規定給兒女衆多的家庭以補助金。第二個五年計劃使蘇聯發生了真正的文化革命，由於普遍的實現義務教育的結果，人民大眾的文化大大提高了。一九三七年，初等及中等學校的學生已增至二千八百萬人（而在一九一四年為八百萬人），高等專門學校的學生增至五十四萬二千人（而在一九一四年為十一萬二千人）。

隨着國民經濟經過社會主義的改造，蘇維埃社會的結構也改變了。這時的蘇聯，剝

前階級已經完全絕路。工人和農民兩個友愛階級組成的社會，保證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在一九三七年，參加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工人和職員，佔全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集體農民及合作化的手工業者，佔百分之五五；軍隊、學生、領取撫卹金者及其他等人，佔百分之四。總加起來，有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四的人都參加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或和它有密切的關係，剩下來的百分之六，是那些個別的個體農民和未合作化的手工業者。

值得我們注意的，在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七年第二個五年計劃之時，資本主義國家正剛好擺脫了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三年的經濟危機，但僅僅過了二年，却又跌進了新的經濟危機的漩渦裏。在一九三七年（第二個五年計劃完成的一年）整個世界資本主義的工業還只達到一九二七年水平的百分之九五——九六，而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却又進入了新的經濟危機了。但是實行了社會主義的蘇聯的工業却絲毫沒有受到這個危機的威脅，反而扶搖日上，當一九三七年末，却已達到一九二九年水平的百分之四百二十八，和戰前水平比較起來，則已增加到七倍多了。

第三個五年計劃

第三個五年計劃，是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二年五年間發展蘇聯國民經濟的計劃，它

的任務是繼續提高生產量，在全世界上和資本主義進行經濟競賽，同時鞏固國防，防止帝國主義的侵略。爲了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得盡量發展機器製造業、重工業及各種工業；改組生產組織與技術；保證國民收入的增長；同時因爲蘇聯處於帝國主義國家包圍的情形之下，必需建立起龐大的國家儲藏，如燃料、電力等，——這就是第三個五年計劃的骨幹。

現在來看它的內容。在工業方面：預定當一九四二年（第三個五年計劃最後一年）蘇聯的全部工業出產總量爲一千八百四十萬萬盧布，比一九三七年（第二個五年計劃最後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九十二。工業生產量每年增加的平均速度應爲百分之十四。在工業中具有領導作用的機器製造業，規定須能保證在國民經濟的各部門及各種國防中建立起一個最進步的技術基礎來。化學工業部門，它的產量應增至二〇四倍。鋼鐵工業部門則規定要大量增加各種特種鋼的出產。

在農業方面，預定在一九四二年，全部農業出產爲三百零五萬萬盧布，比一九三七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二。穀物每年的平均收穫量，應增至八十萬萬普特。

在交通運輸方面：將加強鐵道、河道、及海洋運輸的載重量；電氣化一千八百四十公里鐵道；溝通伏爾加河與頓河；將北海航道改變成一條通用航道，保證歐俄部份與遠東間的經常聯絡。

此外對於增產大量消費品、社會福利文化的設備，開展西伯利亞及遠東一帶的建設

都有具體而驚人的計劃。

這個計劃應在一九四二年完成，但在它完成的前一年，德國法西斯瘋狂的進攻蘇聯，在衛國戰爭開始後，蘇聯經濟建設的任務，不得不變做大量製造軍需品來保證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

在第三個計劃開始後至蘇德戰爭爆發前兩年之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勝利的成績：從社會主義生產制度在蘇聯整個國民經濟中所佔的成份來說：工業總出產量在一九三八年時已增為百分之九九·九（一九三七年為百分之九九·八）；農業總出產量已增至九八·八（一九三七年為百分之九八·六）。一九三八年全部工業的總出產量已增至一千零六十一萬萬盧布（一九三七年為九百五十五萬萬盧布）。在一九四〇年時，工業生產量較一九一三年增加達十二倍，而美國在同期之增加不及一倍。如以一九二九年蘇美兩國之工業生產量為一〇〇，至一九四〇年美國增至一一一時，蘇聯則已增至五三四。自四〇年後，蘇聯工業即已超過英、德、法各國而居歐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第二次大戰中，希特勒匪徒雖在蘇聯造成毀滅性之破壞，但蘇聯工業仍繼續擴充，供應蘇軍頭等武器及配備，保證了戰爭的勝利。在農業方面：一九三九年穀物的出產量已增至六十五萬萬普特，農業機械化也大大提高，僅在一九三九年一年間，農村中使用的拖拉機即增至五十萬架，聯合收穫機增加到十六萬五千架。

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在戰爭中通過了最嚴格的考驗，證明了這種由人民內部生長出

來的制度才能真正使人民像保護自己的眼珠一樣的來保護它。同時蘇聯的三個五年計劃也在戰爭中經過了最嚴格的考驗。如果沒有從一九二八年開始的三個英明的五年計劃，使蘇聯由落後的國家變成全世界最先進的國家，經發展重工業而創造了全世界第一級的工業，由於農業集體化把落後的農業變成了工業的一種變種，要戰勝瘋狂而強大的敵人是不能想像的。

第四個五年計劃

蘇聯在四年衛國戰爭中所受的損失，是無比的慘重，法西斯魔鬼夢想消滅蘇維埃國家，並申言要消滅它的民族，所以在蘇聯淪陷區裏有幾百萬人民遭受慘殺，同時，法西斯曾佔領了蘇聯一七一〇座城市，七萬個以上的村鎮，破壞了六百多萬所建築物，使二千五百萬人無家可歸。破毀了三一八五〇種工業，其中工作人員有四百萬人，蹂躪和搶劫了十萬所集體農場……『任何一個別的國家，甚至於現代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遭受了這樣的損失，也必定會倒退幾十年，變成第二流國家，但蘇聯沒有這樣……』（日丹諾夫——蘇聯共產黨書記）。因為社會主義的蘇聯，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它能夠動員一切力量去從事復興及發展的工作。

所以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〇年的第四個五年計劃的基本經濟政治任務，就是復興國

內的受災區，恢復戰前工農業水準，然後大規模超過這一個水準。除此之外，五年計劃中預定要更進一步發展各加盟共和國的國民經濟。

現在我們來看這個新五年計劃的主要內容：

在工業方面：將工業生產擴大到大概比戰前水準高出一倍半並保證先事復興與發展重工業與鐵道運輸。在二千五百萬盧布的復興與發展國民經濟的集中投資總額中，以二千零四十萬盧布投資於復工和新設的企業。在五年之中，受害區必須恢復，建造三十六隻熔爐，每年能鑄鐵一千萬噸，煉鋼三百八十萬噸；六十七輛壓平機，每年能壓出鋼板七百萬噸。要澈底恢復頓巴斯的重工業，並把頓巴斯、庫齊巴斯和烏拉爾區的重工業繼續向前發展。在電力方面：五年中要使蘇聯原有各電力廠的發電量增加一倍；繼續大量增加戰時在烏拉爾和東部各區建築的電力廠的發電量，計劃建築安加拉河上的水力發電廠（這河在荒涼的伊爾庫茨克省），共發電力要比歐洲最大的德聶泊爾河的發電廠大十二倍。最大的新電廠設立在中亞細亞各地。

新五年計劃中並且預定了黑色金屬工業、燃料工業、化學工業等部門，大規模勞動過程中的全面機械化，並預定了它的發展的飛快速度。新的五年計劃中設立了一個新的工業部門——住宅建築工業，計劃要建築五百萬幢新屋來代替戰時被燬的房屋。

在農業方面：要保證大量提高農產品的產量，以便超過戰前蘇聯全部農業生產的水準。增加供應農業機械設備，達到最大限度的農業機械化。發展農村電氣化。

在交通運輸方面：新五年計劃對鐵路建設的投資是四百零一萬萬盧布，佔五年計劃總投資的六分之一。除了恢復受災區的鐵路網之外，並將建築總長七、二三〇公里的新鐵路（其中有一半在西伯利亞）；電氣化五、三二五公里長的鐵路。水運方面：河上貨運要比戰前提高百分之三十八，海上貨運比戰前超過二·二倍。海船製造工業的計劃要比一九四〇年擴大二·五倍，河船製造業擴大四倍；並保證建設海港、河港及強大的蘇維埃艦隊。航空方面：民用搭客運貨航空線，至少要增加到戰前的四倍；汽車生產方面：要達到每天能生產汽車和貨車一千輛的目標。……

改善勝利後的人民的物質與生活的條件，是新的五年計劃中最重要任務，新計劃預定到一九五〇年時，保證國民收入超過戰前水準百分之三十八。對於城市與鄉村人民的文化生活需要方面的經費，新五年計劃預定要在一九五〇年增加到一千零六十萬萬盧布，超過一九四〇年的水準二·六倍。在學校建設方面：預定到一九五〇年時，高等學校的大學生數量增至六十七萬四千人，中等學校的學生增至一百二十八萬人，並預定要培養教師、科學與技術方面的專門人才。

新的五年計劃執行已將近兩年了，蘇聯人民將令人驚嘆的成績不斷的顯示給全世界。根據現有的、極不完全的材料，我們已可以看到如下的成績：

在工業方面：蘇聯工業復員於一九四六年即已基本完成，爲一切國家中復員最快者，民用物品生產是年較戰時增加達五分之一，而同時美國之工業產量則反較戰時減縮三分之一，迄今爲止，電力生產量已較十月革命前增加幾達四十倍，今年年底時即能超過戰前水平百分之十二，至一九五〇年發電量可達八百二十億瓦特，較一九四〇年激增兩倍。在修復與建造中之動力站數以千計。著名之德聶伯水力發電站已大部修復，其第一部渦輪已於今年一月開始發電，第二部渦輪亦已裝妥。此外在烏拉爾保馬河上僅次於德聶伯之歐洲第二大水力發電站及外高加索庫拉河上亞洲最大之水力發電站均在興建中，後者乃蘇聯進行之最大工程，單爲建築此電站之工廠，即佔地一百五十公頃（合二千四百畝）。鐵路建設，尤爲突飛猛進。根據今年八月份發表的數字，在新五年計劃實行後的一年半中，戰時慘遭破壞的六萬五千公里的鐵路線，長達三百公里的一萬三千座橋樑，四千個車站，一萬五千八百個車頭，四十二萬八千輛鐵廂，已大部修復或重建中。今年七月份的運輸量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十一·五。頓尼茲盆地之煤產，原定一九五〇年完全恢復，但今年八月份即已達戰前水平三分之二，技術裝備且已大大超過。輕工業方面之皮鞋生產較去年同期增加一半有餘。

在人民房屋建築方面：蘇聯西部正在進行人類史上最大規模之住房建築，一九四六年一年中即已獲得輝煌成就，而今年九個月中西部建成的城市住宅總面積已達一百五十餘萬平方公尺，鄉村住宅達十五萬三千幢。較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十。

在農業方面：據最近電訊，今年蘇聯收成，突破一九四〇年之記錄，為歷史上空前的豐收。今年穀物生產總額較去年增加百分之五十八。烏克蘭僅基輔一省目前所繳納之穀物，即達一億六千六百二十五萬噸，遠超過去年同期繳納之數量。據路透社、美聯社等記者估計，豐收將使蘇聯取消戰時以來之口糧配給制，並使蘇聯除按原定計劃向已與蘇聯訂立糧食各國輸出穀物外，至少尚有餘糧五百萬噸可供輸出。今年豐收之主要原因，是因為高度的勞動熱情與最新的技術相結合的結果。全國電氣化計劃正全力進行中，迄今年年底時即能超過戰前水平百分之十二。全蘇農村正飛速電氣化中。目前鄉村之動力站已兩倍於戰前。在一萬五千多個集體農場中，其全部機器與百分之六十的拖拉機站已完全電氣化。若干地區如烏拉爾的西爾得維斯克區的全部集體農場，已有百分之九十五徹底電氣化，超過美國電氣化程度最高之加利福尼亞州，該州電氣化農場尚僅百分之八十三。

在新五年計劃實施期間，湧現了無數新的勞動英雄。新的創造和發明。蘇聯鐵路員工在一年半內創造了五萬件新發明；工程師羅格諾維基因發明加速機車吸水的機器而榮膺斯大林獎金。大學士勞動英雄巴頓及他的助手發明新型自動熔接器，其生產力比美國貨強達四倍之多，有的工業部門的生產力因而提高十倍。礦工茲洛蒂的掘煤機每月出煤七八千噸，而普通每機平均產量為每月三百噸。莫斯科汽車工廠女工庫斯尼佐娃領導的青年工作隊，因其獨創的工作方法，竟使該隊於今年八月中旬即已完成一九五〇年的計

劃。各地工人，也正努力於十月革命節前提早完成本年度計劃來作為對十月革命三十週年最崇高的慶賀。

這就是新五年計劃到今天已經收獲的成績的若干片斷，與已經陷入危機和一天天走向經濟危機的戰後資本主義國家，恰好形成一個鮮明的對照。

